



长汀一中校本课程

北洋军阀史话

谢有亮编写



编者自序

本人对北洋这段历史比较感兴趣。学生时代，历史教科书对这段历史描述比较简短，多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描述，那时外有西方列强欺凌，内有军阀战乱，让我们感觉那段历史很黑暗。但同时其他一些通俗读物，从另一个角度，对那段历史，却又描述的稍显生趣。这让我感到迷茫，北洋时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北洋政府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政府，我很想知道答案。通读由东方出版社出版、来新夏老师的《北洋军阀史》后，对北洋有了一个系统、全面的认识，它既不单单在是以前教科书上那个政治黑暗，外交失败，经济落后的北洋，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北洋。

《北洋军阀史话》作为长汀一中的校本课程，本人以还原尘封历史的真相学术态度，通过具体述说在北洋时期如何催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化新式军队;如何诞生了第一架中国自己制造的飞机;如何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艘万吨级的轮船;如何颁布实施第一部民主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出现与演变，向世人立体呈现出北洋时代所具有的朝气蓬勃的一面。而在这些重大历史述说中，又分别重点解读了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等北洋枭雄，在国家历史大转折、个人命运大洗牌的剧变时期如何各显神通，也为中国的进步而做出一些贡献。用详实史料还原那段被扭曲的历史，反思中华民族近代深重灾难之缘起，挖掘弘扬北洋时代自由民主之精神，让这段历史重新照亮民族的未来。

在编写过程中虽然查阅了大量的有关资料，力求深入浅出、讲解通俗。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学校领导、历史组全体成员的关心和大力支持，在此一并感谢。鉴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诚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完稿于 2018 年 12 月

第一篇 还原真相

1. 北洋时代原来如此

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台湾著名学者李敖曾说：“你们不要再骂北洋军阀了，为什么呢？你们想，他们让你们这个追求进步、反对独裁的北大出现在他们的核心地区，这是需要度量的。”其实何止是北大，近代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学者大师，多数都是在这个时期崛起的，北洋时期也成为继先秦之后，中国再一次出现百家争鸣式的思想文化大发展的黄金时期。

我们以前读过的历史教科书上，总是把北洋时期形容为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黑暗无比。这样的描述，实在是过于表面化，脸谱化。事实上，当我们百年后重新回看北洋时代时，我们发现，这是一个中国王朝政治解体走向宪政民主国家的过渡时代，除了军阀混战政治动荡外，那时也留下了很多正面的东西，比如，那时的中国开始尝试民主，党禁开放，言论自由，政治理性，经济飞速发展，民主和科学理念开始深入人心。

笼统地概括北洋时期，是指从 **1895** 年袁世凯小站练兵，中经武昌起义，清帝逊位、民国创立、军阀混战，直至 **1928** 年奉系易帜，民国在形式上实现一统，这样一个前后共计 **33** 年的时段。如果算上晚清洋务运动中北洋系官员的作用，那么整个北洋集团影响中国长达半个多世纪。

北洋政权是清灭亡后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其存在相比于晚清统治还是有其进步意义的。虽然北洋政府内部矛盾重重，但它的存在至少使得清灭亡后中国保持了名义上的统一。

北洋时期的许多政治人物，既承接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治国安天下的理想，还受到西方民主与科学的影响，他们一方面希望能凭一己之力改变中国分裂落后的现状，另一方面无论是对于国家法制，还是舆论清议，他们从心底里还是有所畏惧。北洋内部派系林立，轮流执政，北洋军阀们几乎都具有一定的传统道德操守和民主政治理想，这些官员多数不贪财，为政廉洁，对民主的奉行和实践令人惊叹，更可贵的是有一种爱国情怀。徐世昌、段祺瑞、曹锟等人，晚年都受到过日本人千方百计

的拉拢，但都断然拒绝了充当傀儡政权的首脑。

历史不应该被随意涂抹，何况只过了不到一百年，那段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应该更客观地去了解那个时代。

袁世凯自小站练兵到接掌北洋，大力兴办各级新式学堂教育，引进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创立了中国近代的军事、司法和教育制度。他在晚清时期高举“立宪”的大旗，几乎是孤军奋战请求立宪，对清末宪政的形成至关重要。可以说，袁世凯对推动中国近代化乃至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他对革命党以及最后“叛乱”的国民党人一直比较宽容。

段祺瑞一生甘于清贫，在史上有“三造共和”之美誉。在其任北洋政府总理时，他“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在他晚年时，日本侵略者希望段祺瑞能出任傀儡政权首脑，用尽办法促他出山，均遭到力辞。这此无不体现了段祺瑞作为中国军人的铮铮铁骨。

吴佩孚一生饱读圣贤之书，人称儒帅。他做人的信条是：“不贪财，不好色，不纳妾，不嫖娼。”在他下台后，生活清苦，张学良经常接济他，但张学良丢失东三省后，他依然毫不留情地大骂张学良，害得张学良从此不敢见他。日本在侵华后，不断试图拉拢他，都被他断然拒绝，他积极为抗战出谋划策，虽然身陷日占区，但绝不跟日伪同流合污，并因拒绝做汉奸，在就医的时候被日本人谋害。

过去评价张作霖总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但实际上，张作霖最后因为拒绝了日本人的无理要求而被日本人炸死。当时的一位西方记者评价张作霖对中国的贡献时说，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张作霖跟俄国人和日本人玩弄国际政治这副牌时却是一个精明的牌手，应付裕如，得心应手，始终保持了东北领土的完整。

说到北洋政府出卖国家主权，最有力的回击是北洋政府一度收复了对满蒙的实际控制权。还有东北，虽然俄国和日本对东北觊觎已久，但奉系军阀还是为中国保住了这块土地，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才被日本人完全占领。

北洋政府历届执政者都坚决地主张外蒙古与中东铁路的权利坚持不卖国的立场。即便袁世凯当初在日本炮口威胁下被迫签订了“二十一条”，

终究还是北洋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在华盛顿和会上把它废除了，成功维护了国家权益。北洋政府废清代不平等条约的努力与成就，更令人刮目，北洋时期 **1921 年 5 月** 签订的《中德协约》是近代以来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另外，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相比于晚清时期的任人宰割，也有了很大提高，在巴黎和会上面对来自美、日两大强国的压力，仍然拒绝在对德合约上签字。同时作为战胜国，北洋政府签署了对奥合约、对匈牙利合约、对保加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战胜国姿态出现于国际社会。其间还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领空权。而入选国联行政院标志着中国具有了处理世界问题的资格，成为中国加入形成中的国际社会的开端。

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相当不简单，在内乱不断的情况下，居然将清朝遗留下来的版图大致维持完整，是不可忽视的成就。

北洋，是一个被丑化的时代。那时虽然军阀混战，但彼此之间还有道义上的约束，倡导和平解决，不会赶尽杀绝；北洋政府近 **20 年** 的统治，先后组成五届国会，基本上没有间断过一院制或两院制国会。

即使在孙中山贸然发动“二次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北洋政府完全可以乘机以颠覆政府罪取缔国民党的合法地位，但是袁世凯并没有取缔当时对自己威胁最大的第一大党，还是按照之前制定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竞选总统。

那时袁世凯声望如日中天，却依然要按照选举法规定，必须获 **3/4** 多数才能当选。然而首轮选举老袁得票未及 **3/4**；黎元洪排第二；接着依法进行第二轮投票，依旧无人过 **3/4**；第三轮就是第二轮得票最多的袁、黎两人对决，票多者赢。目击者称，袁世凯当时非常紧张，绕室彷徨，搓手顿足，六神无主，生怕票数少于黎元洪，大总统被黎元洪夺去。

北洋政府 **1914 年 12 月 29 日** 颁布了《地方自治试行条例》，次年又颁布了它的《施行规则》，还将京兆设为自治模范，公布了《京兆地方自治章程》。到徐世昌时期，**1919 年 9 月 7 日** 颁布《县自治法》后，政府又颁布《县自治法施行细则》、《县议会议员选举规则》、《市自治制》、《乡自治制》等法律法规。北洋以后，中国再无这等“小政

府、大社会”的民主自治模式。

北洋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那时的大学正如李敖教授所说的“政府钱来了留下，公文拿走”。知识分子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文化启蒙运动，缔造了中国文化和教育的黄金时代。

对于北洋时代极少有人知道：这一时期，诞生了第一架中国制造的飞机；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艘万吨级的轮船；这一时期，颁布实施第一部民主宪法；第一次在亚洲实现真正的民主选举；这一时期即使混战不断，仍然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被经济学家称为：“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

彻底终结几千年帝制、探索追求近半世纪共和的北洋大时代，是一个真正多元的、自由的时代，是一个崇尚新文化和新文明的时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是一个中华即将获得振兴的时代。

面对中华民族即将实现第三次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需要还原那段被扭曲的历史，反思中华民族近代深重灾难之缘起，挖掘弘扬那一时期的思想自由的人文精神，让北洋大时代这段历史重新照亮民族未来之路。

2.北洋政府历任总统

袁世凯：1912 年 3 月 10 日—1916 年 6 月 6 日，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

黎元洪：1916 年 6 月 7 日—1917 年 7 月 1 日，被段祺瑞驱走，副总统为冯国璋；

冯国璋：1917 年 7 月 12 日—1918 年 10 月 10 日，代理大总统；

徐世昌：1918 年 10 月 10 日—1922 年 6 月 2 日，第二任大总统，后被直系军阀驱走；

周自齐：1922 年 6 月 2 日—1922 年 6 月 11 日，国务院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务；

黎元洪：1922 年 6 月 11 日—1923 年 6 月 13 日，复任，后被直系军阀驱走；

高凌霨：1923 年 6 月 14 日—1923 年 10 月 10 日，国务院国

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务；

曹锟：**1923 年 10 月 10 日—1924 年 11 月 2 日**，第三任大总统，贿选，后被冯玉祥驱走；

黄郛：**1924 年 11 月 2 日—1924 年 11 月 23 日**，国务院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务；

段祺瑞：**1924 年 11 月 24 日—1926 年 4 月 20 日**，临时执政；

胡惟德：**1926 年 4 月 20 日—1926 年 5 月 13 日**，国务院国务总理摄行临时执政职务；

颜惠庆：**1926 年 5 月 13 日—1926 年 6 月 22 日**，国务院国务总理摄行临时执政职务；

杜锡珪：**1926 年 6 月 22 日—1926 年 10 月 1 日**，国务院国务总理摄行临时执政职务；

顾维钧：**1926 年 10 月 1 日—1927 年 6 月 16 日**，国务院国务总理摄行临时执政职务；

张作霖：**1927 年 6 月 18 日—1928 年 6 月 3 日**，安国军陆海军大元帅。

3.北洋政府起止时间

北洋政府是指 **1912—1928** 年由北洋系军阀控制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通称，这是相对于孙中山领导的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南方成立的广州军政府的称呼。**1912 年 2 月 15 日**，袁世凯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3 月 10 日**在北京就职，又逼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这标志着民国史上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开始。**1925** 年中国国民党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政府，并且由蒋介石领军北伐，但北洋政府持续运作，直到 **1928** 年张学良同意加入国民政府之后正式结束。

4.北洋政府历史地位

北洋政府是由北洋军阀等势力所操控选出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与国务院国务总理所领导，是当时被世界各国承认的中华民国合法政府，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在北洋政府主导下，中国加入协约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

第二篇 袁氏时代

导语：

◎ 近代史上击败日军的第一人是谁？袁世凯为什么在朝鲜与日军作战？平叛后的袁世凯扬名中外，却招来了朝廷上下的嫉妒，他又是怎么化解危机的？

◎ 袁世凯小站练兵竟然练出了 4 位中华民国大总统以及 9 位 17 届总理，他们统治了中国 30 余年。

◎ 袁世凯在称帝前已经是独裁的大总统了，这种终身制的集权式的大总统与皇帝只是名义上的差别，他为什么偏偏要称帝？

袁世凯称帝后 83 天就重病身亡，这段时间里他又经历了什么？

◎ “二十一条”事件的真相是什么？袁世凯到底是卖国贼还是曲线救国？他临死前为什么写下“为日本去一大敌”？

1. 狂放少年乾坤梦——袁世凯发迹之谜（上）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两位毁誉不一的著名历史人物，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袁世凯，其中袁世凯引起的争议更大。有人痛骂他是“窃国大盗”，有人称赞他是“共和先锋”；有人指斥他“丧权辱国”，有人认定他“曲线救国”。那么袁世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袁世凯，字慰亭，咸丰九年（1859 年）生人，祖籍河南省项城县袁寨。袁寨居民多为袁氏族人，以耕读传家，延续数百年，经济条件只能算殷实。袁家真正转运发达，是从袁世凯叔祖袁甲三开始的，“父子进士，兄弟举人，一门两代四贵人”。

所谓“父子进士”，说的是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和堂叔袁保恒，他们分别在道光十五年（1835 年）和道光三十年（1850 年）中了进士；而所谓的“兄弟举人”，指的是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和袁世凯的叔叔袁保庆分别中了举人。其中以袁甲三成就最大，袁甲三历任礼部主事、军机章京、监察御史、兵部给事中等职。咸丰三年（1853 年），太平军攻占南京，清军屡败加之军饷告急，清政府被迫依赖地方上的地主武装，以抵御声势浩大的太平军和淮河流域崛起的捻军。这时，袁甲三主动请缨，以兵科给事中的身份回乡办团练，被清廷任命为帮办团练大臣，驻

军安徽临淮关以镇捻军。

袁家高官辈出，一时间成为“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在那穷乡僻壤的老百姓眼里，袁家俨然一个小王朝了。袁世凯出生那天，袁甲三恰好寄回家书，提到与捻军作战得胜。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大喜过望，于是给新生婴儿取名时定了一个“凯”字，并按照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的辈分排行，给婴儿取名“世凯”。

袁世凯出生的时候，叔父袁保庆在任济南候补知府，曾生一子，但不幸夭折。当时袁保庆已年过四十，考虑到生子无望，兄长袁保中又生有五子，便讨来袁世凯作为过继儿子。袁世凯七岁以后，袁保庆把他接到身边，带着他转辗于济南、扬州、南京等任所，因此，袁世凯自幼就受到了官场的熏陶，大城市的繁华热闹也让幼年的袁世凯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袁世凯像大多数官宦人家的子弟一样，从小便被灌输了读书做官的人生理想。少年的袁世凯颇有才气，满怀雄心壮志，野心勃勃。13岁时，袁世凯曾制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寥寥十字，比之楚霸王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和汉高祖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也”豪气无二，而文采尤过之，从中不难看出袁世凯少年时的才华和抱负。

但是，袁世凯读书并不用心，也不喜欢做文章，为应付科举勉强学习了一点八股的技法。袁世凯喜爱古文，后来他仕途失意，隐居时常读《古文观止》，但从不研究文章技巧，只是摘取其中激烈豪放之句朗朗称颂；他也喜爱读史，却只醉心于古今英雄纵横捭阖之道，从不引经据典，更不求甚解。

袁世凯的文章写得不好，但写得非常有趣。在他十三四岁时，塾师要他做八股文章，恰巧当时他的老师在与客人下围棋，袁世凯忽然来了灵感，挥笔疾书：“道千乘之国，若著此局焉。夫著棋不厌诈也，治国亦不厌诈也。治国非为著棋乎？”

私塾老师看后，大惊失色。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看后也不无担忧地说：“这个孩子志向不小，苟不慎之，覆家灭门，也是可能的。”

袁世凯的一位老师王雁臣曾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题，要他撰写一篇八股文。袁世凯交出的文章从整体上看，糟糕得一塌糊涂，不过其中两段却让人惊叹：

“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稽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

这段文字后来曾广为传诵。少年时期的袁世凯将僵化枯燥的八股文写得如此慷慨激烈，虽不合体制，却难能可贵。

尽管袁世凯不喜欢读书考试，对科场时文更是毫无兴致，袁保庆还是极力让他走科举正途，毕竟读书当官是中国士绅人家对子弟的首要期望。袁保庆在济南府任职时，不惜重金聘请当地的名师宿儒为袁世凯进行启蒙教育；到南京为官后，更是延聘文武兼资的老师对袁世凯进行严格的科举教育。

不幸的是，袁保庆 44 岁那年在南京任上突染疾病，当年便抛下妻儿，撒手人寰。无奈之下，袁保庆的妻子牛氏带着只有 14 岁的嗣子袁世凯回到项城老家。更加不幸的是，就在第二年，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也因病去世。

袁家是官宦之家，衣食无忧，但袁世凯母子毕竟是孤儿寡母，日子并不好过。当时，袁世凯的堂叔袁保恒在做翰林院编修，回乡省亲的时候看到袁世凯年纪虽小，但天资聪明，是个可造之才，就把袁世凯这个侄子带到了京城，打算让他继续读书，日后走科举之道。于是，15 岁那年，袁世凯跟着袁保恒去了北京。

在袁保恒的严格要求之下，袁世凯参加了两次乡试，但一次都没有考中。袁世凯有位饱学诗文的翰林堂叔袁保龄在京为官，他看过袁世凯的文章后说：“慰亭在学问上天分不高，前途不大。”愤怒之下，袁世凯将之前所做的诗文全部付之一炬，恨恨地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齷齪久困笔抵砚间自娱光阴耶？”

这一年，袁世凯只有 20 岁。

2. 暴得第一桶金——袁世凯发迹之谜（中）

袁世凯不愿走科场旧途，他要学汉代名将班超投笔从戎。袁世凯的这个念头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头脑发热，他在幼年时已有从军的志愿。袁家以“求官建功，拯救天下”为门楣家训，叔祖袁甲三又有因战功得高官的荣耀，这些使幼年袁世凯将参军建功当成了自己的梦想。他决心

以叔祖袁甲三为榜样，做个八面威风的大将军。成年后的两次科场失败，尤其是第二次科场失败，让袁世凯彻底下定了参军的决心。

1878 年，袁保恒病逝于开封任上，袁世凯失去依靠，再次返回项城老家。四世同堂的袁家正好在这一年分家，袁世凯以袁保庆唯一嗣子的身份分得了一份丰厚的家产。分家后，家里人还是希望袁世凯走父辈的科举之路，但袁世凯头脑清醒得很，自知不是科举的材料，坚决放弃考取功名的老路，开始另寻出路。

1881 年 5 月，**22** 岁的袁世凯面前摆着两条出路：一是去天津投奔李鸿章；二是去山东登封投奔嗣父袁保庆的把兄弟、庆军统领吴长庆。

当时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任上，声望如日中天。袁世凯对李鸿章的显赫地位，非常钦羡。在洋务派提出的“练兵求强”思想的影响下，袁世凯“好读兵书”，“留心时事”，常作军事论说，志在练兵以“安内攘外”。袁世凯的堂叔、时任内阁中书的袁保龄，对他的见解颇为赞赏，曾情不自禁地表示，袁家“嗣武有人，亦可略慰”。

袁保龄找人为袁世凯写了封推荐信，让他去投李鸿章门下，但拿到推荐信的袁世凯经过三思后，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袁世凯很清楚，李鸿章的幕僚大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人才济济，而自己仅是一个比秀才

略高的拔贡。基于这个现实，袁世凯认为，自己到李鸿章幕府极难有出头之日。因此，经过深思熟虑，袁世凯决定：放弃投奔权势极大的李鸿章，转而去投奔李鸿章的部下、当时驻守山东登州的淮军将领吴长庆。以后的事实证明，袁世凯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个吴长庆后来成为他政治生涯中遇到的第一个贵人，帮袁世凯挖到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一桶金。

1881 年（光绪七年），袁世凯来到山东登州。吴长庆作为李鸿章的一大嫡系，当时正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袁吴两家有着特殊的关系，**1881** 年（光绪七年），袁世凯来到山东登州。吴长庆作为李鸿章的吴长庆是袁保庆的结义兄弟，生死之交，当年袁保庆突然病逝的时候，便是吴长庆亲自料理的丧事。

吴长庆是当时淮系的重要成员，他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颇得李鸿章信任和重用。这也是袁世凯不选势大声隆的李鸿章，而选择当时名声不算显著的吴长庆的主要原因。

由于袁吴两家的特殊关系，吴长庆对袁世凯极为照顾，处处关心、

爱护和培养。而袁世凯自入吴长庆军营，并未因自己与吴长庆的特殊关系而表现出高人一等的傲慢，也没有世家公子惯有的放纵习气，待人处事大方得体，谦卑有礼。

更难得的是，年纪轻轻的袁世凯刚来军中不久，就展现出了干练的办事才能。他自幼熟读兵书，又长于思考，懂得大将治军应“恩威并施，宽猛相济”的道理，协助吴长庆处理了很多棘手的治军问题。袁世凯强调军纪，严于执法，常说：“服从命令者是我手足，违抗军令者就是贼寇仇敌。我必赏必罚，绝不会有一点迁就。”

袁世凯虽然治军极严，但对士卒属下的生活十分关心。对于士兵的伙食日用，袁世凯下令全部要充分供给，不得有丝毫克扣；士兵中有病者他亲自前往抚慰探视，命令给予特殊照顾；夜间巡查军营，看见有在外露宿者，都招呼他们入室休息。袁世凯的这些举措，得到了军中上下的一致称赞。吴长庆对袁世凯的才干也十分认可，视他为左膀右臂，不断提拔重用。

在局势变幻不定的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袁世凯投笔从戎，倒也不失为一个顺应潮流的明智之举。年轻的袁世凯正一步步走向他人生的辉煌，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期待着更大的作为，他在等待机遇，而机遇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不久，袁世凯的机会就来了！

3.近代史上击败日军第一人——袁世凯发迹之谜（下）

1882 年（光绪八年），清廷的属国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朝鲜政局陷入动荡之中。王室危急之际，朝鲜国王李熙向清廷求助，清廷命令吴长庆部开赴朝鲜平乱，23 岁的袁世凯跟随吴长庆秣马厉兵，东渡朝鲜。

进入朝鲜后，清军军纪散漫，常有扰民之事发生，吴长庆将整顿军纪的事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在得到吴长庆的授权后，对于犯令者严惩不贷，迅速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一次，当地百姓控诉清军士兵强奸一名朝鲜妇女，袁世凯得到报告后即刻展开调查，带兵搜捕一昼夜而未进一餐，最终捕获元凶并且手刃之。

对于军中士兵吸食鸦片，袁世凯也是深恶痛绝，抓到必杀无赦，就连跟随吴长庆多年的随从，也因吸食鸦片而被袁世凯所杀。

在袁世凯的协助下，吴长庆很快平定了军乱，安定了局势。在给清

廷的呈报中，吴长庆对袁世凯大加赞扬，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

除此之外，袁世凯还帮朝鲜国王训练了一支 **5000** 人的德式新军，充分展示了袁世凯的军事才能，令朝鲜上下大为折服。

1884 年（光绪十年），属于朝鲜维新派的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驻扎在朝鲜的日军欲趁此机会，挟制朝鲜王室。国王李熙跑到清营求助，袁世凯身先士卒，率领清军一举击溃日军。

袁世凯平定甲申政变，打退了日本在朝鲜的渗透势力，粉碎了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推迟了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间，维系了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

袁世凯的出色表现，受到多方面的高度赞誉。朝鲜外交大臣金允植自“壬午兵变”后与袁世凯过从甚密，“未曾一日相离”，他目睹袁世凯的作风，十分折服推崇。他在赠诗中称赞袁世凯“豪慨似宗悫，英达类周郎”。诗中，宗悫是南北朝时期的名将，他的“乘长风破万里浪”之言后世广为传诵；周郎即三国时期的名将周瑜。可见，这个来自异国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吴长庆的重要助手、清末状元张謇，对袁世凯的军事天才、指挥作风也极为赞赏，说袁世凯是“谢幼度一类的人物”。谢幼度就是因“淝水之战”而闻名于世的东晋名将谢玄，字幼度。而作为师长辈的吴长庆更是引以为豪，他说袁世凯“英达夙成，志气轩豁”，“慰庭是中州有数男儿”。

巧合的是，当时袁世凯的堂叔袁保龄正在李鸿章的幕中且受到倚重。但凡清廷内外有点风吹草动，袁保龄都会提前告知袁世凯并为侄子出谋划策。而在李鸿章面前，袁保龄自然也少不了为袁世凯敲敲边鼓，并在适当的时机为他美言几句。

在张謇的推荐下，袁世凯先后被吴长庆任命为先锋营管带等职务。吴长庆去世之后，庆军将领吴兆有被任命为朝鲜防务总办，袁世凯为营务处会办。由于吴兆有能力远不及袁世凯，朝鲜事务的实际处决权很快落到袁世凯手里。为此，袁世凯遭到很多人的忌恨，清廷中也不断有人弹劾他。

然而，李鸿章力排众议，不仅让袁世凯继续留朝任职，并于 **1890** 年

2月给袁世凯写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评语。

事后，吴兆有等人十分不满，便收集袁世凯在朝鲜的一些劣迹，告知当时回乡应试的张謇，试图借张謇之力来打压袁世凯。张謇在庆军幕府多年，一向为人所敬重，在接到吴兆有等人的信件后，写了一封长达千余言的信斥责袁世凯，语气极为严厉。

在信中，张謇故意不称袁世凯的字“慰亭”而称其为“袁司马”，当时袁世凯的官位是五品候补同知，按清代官制是州的佐官，即汉朝的司马，张謇称呼“袁司马”有暗讽袁世凯篡权之意。张謇在信中说：“别后仅收到你的一封书信，想必是袁司马劳苦功高，日不暇给也。此讯不照平日称而称司马，司马自思何以至此？若果然复三年前之面目，自当仍率三年前之交情，气与词涌，不觉刺刺，听不听其司马自酌之！”此信意在提醒袁世凯只是一个营务处会办，不要妄自尊大，更不要凌驾在总办吴兆有之上。

张謇说得非常刺耳，全文含讥带讽，处处直指袁世凯的要害。袁世凯接到信后气愤难平，好在李鸿章在关键时候识人善用，并没有被吴兆有等人的攻讦所误，袁世凯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升任为朝鲜“监国大员”。这是张謇万万没有想到的。由此，张謇和袁世凯结下了梁子，彼此互不往来近 20 年之久。不过，日后袁世凯当上总统，并没有为难张謇，显现出难得的容人之量。

一个人的成功绝非偶然，他必须在某些重要关头表现出杰出的能力与才华，从而获得更好的机会。

对于袁世凯来说，朝鲜正是他施展身手的好地方，也是他飞黄腾达的起步点，为他日后在军政领域叱咤风云提供了一个不低的起点，从此，袁世凯正式登上了中国近代史的大舞台。

4. 官场心计——中国陆军奠基者袁世凯的才干

天津小站镇，虽然总面积只有 56.75 平方公里，却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奠基地。这个此前一直默默无闻的小镇位于天津市津南区，因袁世凯曾在这里练兵而闻名天下。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很多北洋系军阀都是在这里起家的。直到 1928 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为止，从这里走出去的将军们统治了中国 30 余年。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惨败后，意识到现代军队建设的重要性，很快就任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式陆军。

袁世凯到任后，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以德国和日本的建制标准，将新建陆军分步、炮、工、骑、辎等兵种，建立起了中国的第一支新式陆军。

痛心于清军的积弱和甲午战争的失败，袁世凯极力变革旧的军制以监管新军：首先，军容要壮观，新军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其次，装备要近代化，新军的武器装备一律从外国购进，炮兵装备德国过山炮、半陆路炮，步兵骑兵使用奥国造的曼利夏军械，军官佩带当时比较先进的左轮手枪和佩刀；再次，重视人才建设，建立了炮兵、步兵、骑兵、德文等“行营武备学堂”，各学堂均聘请德国军官担任总教习，培养了一批中下级军官，有效提高了士兵的素质。袁世凯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军队近代化的主要奠基者。

小站练兵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也深深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它催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化新式军队，对中国陆军的近代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袁世凯小站练兵，练出了一批精兵强将，也正是这一批班底奠定了北洋军阀集团的人才基础。这批人中当到各省督军以上官职者有 **34** 人，其中包括 **4** 位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1** 位行使总统职权的临时执政（段祺瑞）。从 **1912** 年 **3** 月 **13** 日至 **1928** 年 **6** 月 **3** 日，北洋政府 **46** 届政府总理中，有 **9** 位 **17** 届总理（唐绍仪、赵秉钧、段祺瑞、徐世昌、江朝宗、王士珍、靳云鹏、张绍曾、贾德耀）曾跟随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或在“北洋六镇”出任过官佐。

自袁世凯 **1912** 年担任民国大总统，至 **1928** 年张作霖被炸身亡，小站练兵形成的北洋军阀集团，统治中国十几年，掌握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实权，这段时期也成为中国近代群雄争霸最为激烈纷乱的时期。

1901 年李鸿章死后，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兼任练兵大臣，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1905** 年陆续编练完成了北洋六镇新军。到 **1906** 年前后，袁世凯不但控制着中国唯一一支十万人的近代化武装力量，还取得了身兼八大臣的特殊政治地位。这八大臣分别是：参与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督办

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

换言之，这个时期，清廷的所有军政事务，基本都决定于一个人，他就是袁世凯。

正所谓功高震主，此时的慈禧为“裁抑”袁世凯及其北洋势力，免去了他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职，内调军机处担任军机大臣。慈禧的这个举措，不但没削弱袁世凯的势力，反而被袁世凯利用，借在军机处主事的机会，加快了他的政治理想——立宪政治的步伐。自 1908 年军机处重组之后，清政府的《资政院章程》、《钦定宪法大纲》等一系列立宪文件相继颁发，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立宪机构相继设立，袁世凯还要求设立责任内阁，清廷立宪政治的步伐明显加快。袁世凯因此获得中国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好感，他们在袁世凯的身上看到了中国实行立宪政治的希望。

在当时，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的眼中，袁世凯都是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为重要的人物。假如历史真照此发展下去，中国未必不会走上一条君主立宪之路。

然而，历史没有给袁世凯太多时间，1908 年 11 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前后相隔不到一天时间。两宫驾崩后，光绪的弟弟载沣被推上了摄政王的位置。而载沣上台后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袁世凯。

载沣没有杀了袁世凯，仅仅是解除了袁世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官职，将其打发回了河南老家。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录道：对载沣来说，“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其实对于大清朝来说何尝不是如此。经过了这次的生死考验，袁世凯彻底对清王朝死了心，在辛亥革命中他养患自重，逼帝逊位，并成功当选民国大总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兵不血刃的改朝换代。

5.半推半就称帝之谜——解密袁世凯称帝的真实意图

回顾历史我们不禁发问：在称帝前，袁世凯已是独掌大权的民国大总统了，为什么还要图皇帝这个虚名呢？当时，他的大总统是终身制的，甚至可能成为家族制，这种终身制的集权式的大总统和封建帝王相差无几。至今仍有很多历史学家提出疑问：袁世凯当初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难道仅仅是贪慕虚名吗？

1911 年，世界强国中只有法、美两个民主共和国家，英、日、德那时实行的都是君主立宪制。对于积弱的中国来说，法国那种激进的革命方式非但无法实现民主共和，甚至会造成巨大的灾难。美国的民主道路比较顺利，但美国的情况极为特殊，它的文明史短暂，没有经历长时期的专制传统，建国时期的社会各阶层民众，已然接受并习惯了从英国舶来的议会政治。而中国经历过长达 **2000** 多年的帝王专制统治，以至于当时在中小城市和农村里，普通老百姓只知道皇帝，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总统。

推翻帝制后，民主共和在中国的表现确实是令人失望的。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直接关系。民国初建，共和国这个理想虽然在中国出现了，但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实施民主共和的主客观条件。对于 **90%** 人口是农民、**80%** 人口是文盲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无论坐在龙廷的那个人叫皇帝还是总统，在省城管事的叫巡抚还是都督，都没有给生活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当时国民思想整体封建保守，对于从天而降的共和体制都有些无所适从。社会问题随之日趋严重，老百姓普遍认为：皇帝就是王法的象征，没有皇帝，也就无所谓王法了；没有了王法的约束，原本暗藏的种种罪恶随之凸显出来。原来贩卖私盐大都是地下交易，现在在市场上公开买卖；以前土匪都是夜黑风高作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抢劫。这就是袁世凯称帝前的社会状况，实际上已经处于全面瘫痪的临界阶段。

旧的权威打掉了，新的权威却没有及时树立起来，社会急需新权威的出现，以维系短时期内的稳定局面，杜绝社会秩序的完全崩溃。

孙文借宋教仁被刺案之机发动二次革命，表面上刚刚稳定下来的国家再次陷入混乱。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彻底丧失与北洋集团抗衡的实力。没有不同派系的实力彼此制衡，资产阶级式的民主共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石。

削弱最大的政敌后，袁世凯摆脱了原来的种种制约，开始实施中央集权。在打败了国民党后，袁世凯的声望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他拥有了在中国实现威权制度的机会和权力，中国当时的国情似乎也急需建立新的权威。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北洋集团和国民党，当时还至少存在 **300** 个上

形形色色的政治团体。此外，政府派将军到地方当督军，他们掌握军政大权后与中央貌合神离，拖欠税款之类的事情时有发生。袁世凯等社会政治精英发现：共和后的中国非但没有变得更加强大，反而愈加衰弱，看起来比以前更像一盘散沙了。而“二十一条”最终证明，

共和体制下的集权并没有增强中国的外交实力，本国的凝聚力也随之下降。

在内外交困中，袁世凯发现必须要寻找一个东西，一个精神的东西、制度的东西，把中国重新扶起来。于是，他想到了有传统道德做支撑的皇帝权威。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专制皇帝肯定是不能当的，这一点袁世凯不会想不到。袁世凯称帝的年号为“洪宪”，从字面上不难看出，袁世凯称帝的本意是想实行君主立宪。

从当时中国的国情来看，选择君主立宪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当时，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性宗教信仰，因而需要一种共同的精神信仰凝聚国人，最佳选择莫过于延续了几千年的忠君爱国思想。在封建思想中，国家的代表者是君王，爱国就是忠君，忠君就是爱国。在这种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作用下，袁世凯想到了称帝，他想以君主的权威来凝聚国人。

茅于軾老先生在接受《北洋大时代》创作组专访时，对于袁世凯这样说道：“他手里头有很强的兵权，而且这个人很能干，他联络的社会各方面的人脉非常的广，所以孙中山斗不过他，临时大总统就只得让了位。在袁世凯最初当总统的几年，他摆平了中国的各种势力，他是想要把中国改变成有规则有制度的国家。但是他没有摆脱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他还是想当皇帝，认为利用皇帝的权威可以把中国当时的各种问题简单化，一切问题就好解决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他自己也有野心。但是，他的主要出发点，还是觉得独裁更有利于实现他的理想，他当时是必然有这么个考虑的。”

对于当时中国的体制，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统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

他很不看好民国的未来，断定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他还预言“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古德诺

直接指出，中国必须要实施君主立宪才有未来，否则将有混乱及亡国的危险。这些话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后来，袁世凯取消帝制，民国总统更换频繁，导致国家混乱，国力日益衰弱，直至日本侵华，几乎亡国。

称帝前的准备阶段，袁世凯忽略了一点：老百姓被几千年的皇权政治害苦了，对皇帝深恶痛绝，根本不管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有着什么区别，只要是与皇帝有关的东西，就全盘视为封建君主专制的余孽。

总结袁世凯称帝失败的原因，其中主要一点就是：他没有动用国家强大的宣传机器，向天下人普及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区别。位居极权的他，误以为自己称帝是众望所归，全国臣民每天都在心悦诚服劝进。

以至于称帝后，他才恍然发现原来很多人是反对的。为此，他曾经怒斥周围那些劝进的人：“就是你们逼我做皇帝的！”

从帝制到民主是一种进化，是不容许倒退的过程，当全民认同民主共和要好于帝制的时候，老百姓不管也分不清楚你这个君主立不立宪，只要是当皇帝就是倒退，就是复辟，就要推翻。

如果袁世凯不称帝，各省反抗中央要背着反叛的罪名。袁世凯一旦称帝，各省就有了一个“反复辟、反倒退”的正当借口，而这个借口的力量空前地强大，蔡锷三千护国军一声呐喊，几个月之内全国的形势都随之改变了。

袁世凯不是民族英雄，但也不是十恶不赦的民族罪人。即使是那些视袁世凯为窃国大盗的人，也无法回避一个事实：袁世凯是把中国带进民主体制的第一人。

遗憾的是，历史只给了他几十天的时间，连拿个宪政框架的时间都不够。如果袁世凯多活几年，也许中华民族会少些后来的不堪与苦难呢！

6.袁世凯最后的日子——袁大头何以成为“冤”大头

历史学家袁伟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对政治人物，与其追究其道德，不如认真关注他在制度建设上的取向和作为，那才是影响深远的东西。

民国三年版的银元，正面是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的头像，因此民间又俗称其为“袁大头”。

当看到这个“袁大头”时，我们脑海中浮现的袁世凯往往是一个形象不佳的窃国大盗、卖国贼。但近年来亦有不在少数的学界观点认为：

如果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看到的真实的袁世凯却是一位维护国家利益、祖国统一的爱国领袖，一位高瞻远瞩、厉行新政的改革家，一位治世的能臣、乱世的人杰。

在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情节，传统的说法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慈禧政变。究竟袁世凯怎么告的密？至今众说纷纭，留下重重疑团。近几十年来，不少历史学家对此提出质疑，否定了因袁世凯告密导致慈禧政变之说。

我们不难看出，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西太后政变，而是西太后早有政变的打算，并已提前做好了部署。袁世凯见大事不妙，为求自保，只好和盘托出维新派“围园劫后”的计划。

维新派缺乏政治经验，由他们主导的百日维新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事实上，他们所提出的新政思想，基本都在袁世凯这位实干家的手中得以实现了。

晚清第一重臣李鸿章临死之前，向朝廷举荐袁世凯接替其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很多德高望重的重臣如刘坤一等也都举荐袁世凯，西方列强也要求袁世凯出任此职。在众望所归下，朝廷在李鸿章逝世当天，任命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可见当时袁世凯的能力、功绩以及德行得到了清廷上下的一致认可。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说袁世凯是举国上下最受欢迎的人毫不为过。一、他带过一支最好的军队，在军队中威望颇高；二、革命党主张驱除鞑虏，袁世凯逼清帝退位，使中国第一次兵不血刃地完成了改朝换代，于革命有功；三、他是官僚队伍中的改革派，受到了各省咨议局议员的欢迎；四、和清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满清的遗老遗少们指望着他常权从而得到退位优厚待遇；五、能维护中国的稳定，保护各国的在华利益，西方列强的不二人选；六、厉行新政的实干家；七、曾因是汉人被清政府罢免，受到过不公正对待；八、人缘好，人脉广，军政班底雄厚；九、不极端，不保守，各方都能接受。

基于以上原因，甚至是黄兴等革命党人也属意于让袁世凯当民国总统。孙中山虽然看不惯这个旧官僚，但苦于手中无钱无兵，迫于无奈，只好迁就让位。

袁世凯年轻时曾参与入朝平叛，维护了清王朝在朝鲜的宗主国地，

并自那时起与日本展开了全面对抗。回国后至辛亥革命前，袁世凯放弃了以日为师的旧主张，采取联英、美以制日、俄的对策。在他当上民国总统之后，还挫败过俄国策动外蒙独立的阴谋。

可以说，袁世凯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的努力，并不逊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后世之所以说袁世凯卖国，主要是因为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当时的中国从帝制迈入共和，在亚洲众多国家中第一个建立共和体制。但清王朝晚期的腐败、没落，已使国力尽衰。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的政体，但国力仍然贫弱。“二十一条”是在第一次世界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它不是条约，而是日本为窃取在华利益而向中国政府提出的无理要求。

纵观“二十一条”签订的整个过程，袁世凯作为一国元首在“弱国无外交”的环境下据理力争，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主权。他曾对时任政治顾问的英国人莫理循说：“绝不同意那些条款，即使日军打到新华门，也不同意。”袁世凯指示下属在谈判中采用“拖”字诀与日本周旋，同时把消息透露给英、美等国，以引起国际干涉。当时中国积弱动荡，面对强横的日本，谈判是很困难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袁世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及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共十一条，不包含出卖主权的条款，勉强达到了中国利益最大化。

在签约后，袁世凯先于国人将签约日（5月9日）定为“国耻日”，并誓言“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足见其卧薪尝胆的决心。

事实上，由于国人的强烈反对，袁世凯政府事后声明这些条约是被迫签订的，当时及以后历届中国政府始终没有予以承认。所以这些条约实际上从未生效过，也不具备国际法的法律效力。因此，在日方的档案中，这是一场失败的交涉，日本外务大臣因此辞职。

袁世凯一生痛恨日本，执政期间骂日本人最多，曾经多次当众痛斥日本使者，他的自挽联这样写道：“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由此看来，说袁世凯亲日卖国应该是被过分夸大了。

7. 民国没有他真不行了——帝国骄雄袁世凯的价值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现在我们过春节与一个所谓的“卖国贼”有关，**100**年前正是他力排众议，将正月初一定名为春节，并发布法令全国放假。

他是中国现代化军队的奠基者，建立了中国第一支现代化陆军及一大批军事院校；

他是中国警察制度的缔造者，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警察部队；

他兴办新式学堂，创办山东大学，最终于 **1906** 年水到渠成，与张之洞联名奏请清廷废除了科举制；

他兴建科技、路矿及各种现代化企业；

他成功说服西太后批准立宪计划，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设各省咨议局，推动地方自治；创办或改革邮传、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新式币制……

他就是清末民初中国最具争议性的人物—袁世凯。

没有一个晚清官吏能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比袁世凯取得更多的改革成就。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袁世凯几乎参与了大清帝末年在制度上进行的所有改革举措。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梟雄。”历史上对曹操的这个评价，似乎也适合转予袁世凯。评价这样一位充满争议性的人物并不容易。早在“文革”时期，陈伯达就已将“窃国大盗”、“卖国贼”的帽子重重地扣在了袁世凯头上。然而，当我们以审慎的态度回望那段历史，站在历史的高处回顾百年前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我们不难发现，他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无法抹杀的，他是中国近现代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一、他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功臣之一。

辛亥革命前，袁世凯为支持立宪在各省设立咨议局，为革命后的政体建立打下了良好基础。武昌起义后十几个省纷纷宣布独立，形势看似一片大好。但当时革命派内部成员构成很复杂，许多旧官僚和立宪党人也混迹其中，各持观望态度，争权夺利。同时，清政府仍旧控制着中心地区，革命派的军事实力还无法与北洋军队抗衡。

在这个关键时刻，袁世凯促成南北和谈，清廷退位，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改朝换代，避免了大量的伤亡损失，实现了国人梦寐以求的共和体制。时人对此举的评价很高，孙中山曾公开称隆裕太

后为“女中尧舜”，对袁世凯也是极加赞誉。所以说，辛亥革命中终结满清王朝的主要功劳应当记在袁世凯头上。

二、他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武昌首义后，革命党人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宣传口号，初衷是为了煽动汉人推翻满清统治，但同时无疑给蒙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带来很大恐慌，引发了一系列排汉高潮，导致了严重的民族分裂问题。英、俄两国趁机阴谋策划西藏和外蒙古地区脱离中国。正是有袁世凯这样一位强势人物坐镇，才保全了中国对西藏和外蒙古的主权，国家才没有四分五裂，混乱局面迅速得以平息，社会恢复稳定，顺利完成了新老政权的过渡和新旧制度的变革。

三、他有力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建设。

袁世凯广泛延纳从海外学成归来的新学精英并委以重任；采纳西法编练新军，并同徐世昌、段祺瑞等编著了《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和《训练操详晰图说》，这两部书迄今仍被军事研究部门作为《中国兵书集成》压卷之作；领衔废除了在中国沿袭 1000 多年的科举制度，大力兴办各级新式教育；仿效西方建立巡警制度；他说过“官可不做，实业不可不办”的传世名言，开矿设厂，大兴实业，发展经济，中国第一个电灯厂正是他创办的，使电灯走入中国百姓生活；他曾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尝试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1907 年，在他下辖的天津，袁世凯主持了中国首次地方选举。

在清末民初，中国正处在国家历史大转折、个人命运大洗牌的剧变时期，各路精英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各显神通。在为数众多的精英中，世凯脱颖而出，并广为这些社会精英所认可，说他靠的仅仅是玩弄权术手段是解释不通的。

我们必须直面历史，正视所有曾经为中国进步而作出贡献的民族精英。

8. 爱国还是卖国？——诡异的“二十一条”事件真相之谜

很多国人提及“二十一条”，必痛骂袁世凯，其实“二十一条”究竟有哪些内容，却鲜有人知晓。

1914 年 6 月 28 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

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奥同盟国向俄英法协约国开战。日本乘机谋划夺取德国在华的侵略权益。

9月1日，日本陆军在山东半岛登陆，向德军开战。11月7日，被围困两个月的青岛德军向日本投降。随后，日本继承了德国的一切在华侵略权益。

在得知日军侵占山东半岛后，袁世凯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在会议上，袁世凯决定仿照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的老办法，划定日军出境的走廊和交战区，以尽可能地防止战争波及其他地区。然而，战胜国日本的野心不会满足于继承德国的既得利益。

1915年1月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抛出了日本政府的对华五大项共二十一条要求。依照这些要求，日本不仅要把山东和东北变为它的殖民地，还要把整个中国变成它的保护国，这就是骇人听闻的“二十一条”。

这“二十一条”主要内容是：

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

②承认日本人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长至99年。

③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

④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

⑤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以及一些地区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

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是以内田良平的《对华问题解决意见书》为蓝本的，这个蓝本具有清晰的侵华步骤和计划蓝图。因此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在收到“二十一条”后，袁世凯表面上未动声色，只是对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说事关交涉事宜，必须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届时由外交部总长与日本公使交涉。等到日本公使走后，感到事态严重的袁世凯立即召集紧急会议，集体讨论对策。

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事实上是有备而来的。日本料到中国没有反抗的能力，从一开始就警告袁世凯，这是一个秘密条约，必须从速商定，不能外泄。如果中国不答应，日本就要海陆并进，大举进攻。当时的西方列强几乎都陷于战争之中，没有能力来干涉中日之事。所以，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径已然肆无忌惮。

从现存档案的“二十一条”的批示上不难看出，这一事件是袁世凯从政以来最为严重的外交危机。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批示非常详细，逐条圈注，反复斟酌。

所幸的是，袁世凯的应对还是有效得体的。袁世凯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利用各种渠道摸清日方的底牌。他先是派出日籍顾问有贺长雄返回日本，访问日本政界元老松方正义及山县有朋，打探其中的内幕；随后又派人花重金收买日本间谍，调查日方的有关情况，以在谈判中争取主动。

为配合摸底活动，袁世凯在谈判中故意采取了拖延战术。他首先启用善于在困难局面中谈判的前外交总长陆征祥，并指示在谈判中逐条商议，拖延时间。随后向日本提出因事务繁忙，每周开一次会。在会议上，他让陆征祥拖延喝茶的时间，尽量减少商议的事项。

袁世凯的努力没有白费，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一事并没有经过御前会议，而是大隈重信内阁擅自采取的秘密行动。

因此，袁世凯将“二十一条”的内容，通过报纸及外交渠道泄露出去，使日本试图尽快结束同中国的秘密谈判的计划成为泡影。此内容泄露之后，不仅国人哗然，在国际上也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美国，“二十一条”成为了当日报纸的头条新闻，美国政府开始对中日谈判进行干涉。谈判有第三方介入后，很多内容就得重新再谈。就这样，袁世凯又成功地拖延了四个月。

日本见在谈判桌上迟迟无法取得进展，随后就在东北、山东、福建沿海等地增兵，并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限中国在 48 小时之内给予满意答复，否则就使用武力。

针对日本的最后通牒，袁世凯召集各部门首长开会。会议上，袁世凯悲愤陈词，称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只能暂时屈辱，不然，十年之后，非但不能与日本一较高下，亡国危险更甚今日。

1915 年 5 月 9 日，外交部长陆征祥及中方谈判代表将“二十一条”最终修订版交给了日本公使日置益，危机暂时化解。尽管兵临城下，中国交给日本的“二十一条”修订版和原“二十一条”相比，还是差之甚远。在四个多月的艰苦谈判中，中方不仅力争删除了第五条及前四条的部分条款，其他很多原来的侵略要求条文也变成了“留待日后磋商”，或是加进了限制条件，最后中日签订的“二十一条”实际上只有十二条。

那么在签订了十二条条款后，袁世凯又是如何应付日本人的呢？

袁世凯是个极为聪明的人，自有应对办法，例如已签订了的条款中涉及允许南满、东蒙地区中日杂居以及杂居地商租权问题、聘请日本顾问问题，袁世凯就说：“购买租地，我叫他一寸土地也买不走；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会有生命危险；日本顾问，一个月给他两个钱，至于顾不顾，问不问，权力在我手。”

总之，袁世凯想尽方法限制日本在中国使用这十二条，抵制日本人在中国的恶劣行径，同时，袁世凯政府还巧妙地放纵并利用民间反日舆论，打击日本的嚣张气焰。那一时期，民情沸腾，纷纷抵制日货，爱国情绪日益高涨。在长达 8 个月的抗议浪潮中，日本成了过街老鼠，不仅在经济上受到重大损失，国际声誉上也遭受重创，面临着来自美国 and 英俄等国的压力与指责。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评价的：日本虽然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但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反而弄得臭名昭著，为天下人耻笑。

不仅如此，大隈重信因为未经御前会议就贸然提出“二十一条”，导致外交失败、经济受损而下台。日本试图将中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的阴谋彻底破产。但中国在这次危机中，同样遭受了损失，被迫延长旅、大租借期至 99 年。如果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双方实力，在这次危机中袁世凯所采取的外交谈判手段还是可圈可点的。如巧妙释放谈判信息，利用民间反日舆论让日本知难而退。毕竟当时中日实力差距较大，逞一时之勇并非明智之策。可以说，袁世凯在谈判中所作的牺牲和让步，属于委曲求全的屈辱外交，并非完全卖国性质。

无法否认，“二十一条”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外交耻辱，所谓弱国无外交，如果中国坚决不签订“二十一条”，中日战争也许会提前 20 年全面爆发。但是那时的国力财力肯定比不上 20 年前甲午战争时期的

清朝，甚至远不如 20 年后的国民党时期。

第三篇 皖系掌权

导语：

◎ 段祺瑞为什么被人称作“六不总理”？“北洋三杰”又是哪三位？段祺瑞“三造共和”又是怎么回事？

◎ 中华民国总理段祺瑞为什么当街长跪不起？他一生信佛吃斋，甚至弥留病重时也不肯听从医生的建议进食肉菜，至死恪守信念。这一切都与那次惨案有关……

◎ 黎元洪老实待在家里却被抓去当了革命军政府的都督，又被袁世凯强迫着赴京就职民国副总统，尔后反复被逼走又被请回来，这其中有着怎样的曲折？

◎ 冯国璋为什么被称为民国总统位置上的临时工？“卖鱼总统”又是怎么回事？徐世昌为什么被称为“文治总统”？作为北洋时期唯一的一位文人总统，他的为官秘诀又是什么？

1.坎坷少年英雄泪——段祺瑞的奋斗

北洋，中国历史上又一段诸侯割据群雄纷起的时期。袁世凯死后再无人可以掌控全局，北洋系军阀开始四分五裂。根据将领们的籍贯属地、军学出身，或者平日的交好程度，北洋军阀自然地形成诸多派系。各派系为了争权夺利，攻战不已。军阀混战导致政权更迭频繁，短短的 13 年时间里，就出现了 38 届内阁，最短的两届只持续了 6 天。

在诸多派系的军阀中，有这样一个他，他以“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自居，人称“六不总理”。在物欲横流、无官不贪的民国时期，他算得上官场中的另类，却又是当时官场中人的楷模。他就是北洋三杰之一，一生曾经三次缔造共和的皖系统领段祺瑞。

段祺瑞，字芝泉，1865 年出生于安徽六安县太平集北的段家老宅。

段祺瑞出身于一个军人家庭，其祖父段佩隶属于李鸿章的淮军体系之下，早年因镇压捻军有功而官居淮军统领。

段祺瑞小时候受祖父的影响很大，7 岁时便被祖父段佩接到自己在宿迁的兵营，由此耳濡目染了军旅生活。尽管段佩给段祺瑞请了塾师带

他念书，年少时的段祺瑞却更喜欢舞刀弄棍，看书也偏好关于排兵布阵、奇门遁甲之类的兵书。在那段日子里，作为小少爷的段祺瑞过得还是很惬意的。

但是，好日子在段祺瑞 14 岁的时候戛然而止，他的祖父段佩在宿迁驻地突然亡故。失去了庇护后，小段祺瑞在军营中无以托身，只得随祖父的灵柩回合肥老家。不久后，他只身一人步行 2000 多里，赶到山东威海投奔堂叔段从德，在他的手下做了一名小兵。这一年，段祺瑞才 16 岁。

然而不幸接踵而至，在段祺瑞到威海的第二年，其父段从文在来威海看望儿子后回家途中被盗贼所害；8 个月后，段祺瑞的母亲因为哀痛过度，也不幸亡故。一年之内，父母双亡，段祺瑞这才被批准回家奔丧。回到家中后，看着自己年幼的弟弟妹妹，18 岁的段祺瑞心情十分沉重。作为家中的长子，段祺瑞在父母双亡的情况下，必须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生活的重担。

家庭的变故和养家糊口的重担，使得段祺瑞心事重重，愁眉不展。作为普通一兵，段祺瑞是看不到生活的希望的。但很快，段祺瑞迎来了时来运转的好机会。1885 年，李鸿章创立了天津武备学堂，拟从淮军中招收学员。听说这一消息后，刚满 20 岁的段祺瑞喜出望外，他决心要抓住这改变命运的绝好机会。于是，他立刻报名应征并在考试中名列前茅，最终被选入炮兵科学习。

两年后，段祺瑞以“最优秀”的成绩从学堂毕业，随后又被选派到德国去学习军事。这其中还有一段小波折。据说，在初选名单里本来是没有段祺瑞的，但李鸿章看到选派人员中安徽籍的只有两个人，心中十分不悦，于是把山东籍的划掉一个，改选了一个小老乡，这个小老乡就是段祺瑞。李鸿章被人称为“李合肥”，段祺瑞后来也被称为“段合肥”，这两人还真很有缘分。

段祺瑞学成回国后，李鸿章再次指派他前往克虏伯兵工厂实习，以熟悉并学习世界最先进火炮的制造和使用技术。1890 年年底，25 岁的段祺瑞学成归来，先后任职于北洋军械局和威海武备学堂，成为当时最早的一批留洋军事人才。

甲午中日战争后，袁世凯奉旨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并在

保定创办新式陆军军官学校，正当亟需用人之际，时任天津武备学堂总办的荫昌将段祺瑞推荐到袁世凯的门下。段祺瑞不凡的背景和资历，引起了袁世凯的注意。当时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是一支拥有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等多兵种的新式部队，其中炮兵就有近 **2000** 人。

到小站后，段祺瑞被委任为炮队统带，这支炮队有速射炮、重炮等 **60** 门，战马近 **500** 匹。这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支正规化的炮兵部队，段祺瑞也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任炮兵司令。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段祺瑞很快得到袁世凯的器重，先后担任过北洋新军第三、四、六镇统制等职。随着在军界的地位不断地攀升，段祺瑞在政界也迅速崛起，开始步入北洋集团的核心圈子。

在促成袁世凯再度出山、对清室逼宫、促成南北议和、镇压“二次革命”等重大事件中，段祺瑞谋划方略，调兵遣将，不遗余力，为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和战胜国民党立下了汗马功劳。段祺瑞成为袁世凯的得力干将，被誉为“北洋三杰”之一。

袁世凯不断升迁，段祺瑞也跟着沾光，得到了北洋六镇的统制之职。在清朝覆灭后，段祺瑞做过几任陆军总长，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隐居西山。袁世凯死前，命人将段祺瑞找来并将国事托付给他，段祺瑞因而成为民国的内阁总理，成为当时政坛的头号风云人物。

2.当街长跪的大国总理——皈依佛门的段祺瑞

段祺瑞为人一向严峻，脸上几无笑容，连他的家人都不喜欢和他待在一起。不过，段祺瑞在饮食上有个习惯，那就是他除了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外，一般都是一个人单吃，不和家人同桌吃饭。

事实上，他不和家人一起吃饭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避开荤腥，发展到后来，干脆吃斋念佛了。在 **1920** 年的直皖战争中，段祺瑞与曹锟、吴佩孚恶战一场，最终以惨败而告终。战后这段时期老段闲居，有时间去参访大德高僧，佛学修为大为精进。搬到天津后，他开始正式吃斋，并在家里辟出一间佛堂，每日清晨起来焚香念经成为他每天的功课，从未间断。

段祺瑞信佛，一则与他在袁世凯时期曾在西山休养、接触佛学有关；二则希望借此走出直皖战争惨败的阴影。当然最主要的是他身为军人，

杀戮过多畏惧果报，因而要每日诵经以超度那些在战场上丧生的亡魂。

1918 年，在反对张勋复辟的战役中，讨逆军抓了一些“辫子军”，段祺瑞部下靳云鹏请求杀几个战俘以振军威。段祺瑞听后很不高兴地说：“罪张勋一人，这些官兵们有什么罪？杀几个人有什么用？你们总是好杀人，‘杀人者人恒杀之’，哪一个好杀人的人有好结果呢？”

段祺瑞被人称为“北洋之虎”，但很多人说他有虎相而无虎威，宅心仁厚，过于正道。段祺瑞信佛与当时天津的风气也有关系。在清末民初，各种社会思潮纷起，其中佛教最兴盛，天津的寺庙特别多，几乎可以用“无人不信神、无处不建庙”来形容。一些出名的寺庙，如海光寺、大悲院等，僧人、居士数量都很庞大。当时的一些政客、军人，还有前清的一些遗老遗少，来到天津做寓公，其中有很多人热衷于宗教活动，尤以历史久远的佛教最多。

在皈依佛教后，段祺瑞起了一个法名叫“正道居士”。每到初一、十五，段祺瑞都要亲自到庙里去做法事。

在直皖战争失败后，段祺瑞虽说已经吃斋念佛，但他并没有真正看破红尘，做到四大皆空。每次有学生、旧部、朋友来拜见他，说起国内战火纷飞、人民流离失所的时候，段祺瑞总是板着脸，一言不发。唯独当他们说到“要收拾局面，非老师东山再起不可”之时，段祺瑞一贯冷若冰霜的脸上，才会多少露出点欣慰的笑容。

时隔四年后的 1924 年，段祺瑞再次出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重新回到了政坛。和从前一样，段祺瑞仍旧是上午办公，下午下棋或者赋诗，晚上打牌，与之前不同的是，他每天早上必到公馆中专门的佛堂去诵经。

一年半后，在执政府门口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闻讯后立即赶到血案现场，曾长跪不起，为死者超度。不久，被世人误解的段祺瑞主动再次下野。从此，他彻底远离了纷繁多变的政治漩涡，而只在家中吃斋念佛，下棋写字，不再再过问世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把侵略的魔爪从东北延伸向华北，并试图拉拢段祺瑞出来充当代理人。为防止段祺瑞为日本人所用，蒋介石在 1933 年 1 月 21 日派人将段祺瑞从天津接到南京。在浦口乘船过长江的时候，蒋介石率一批高级将领亲自前来迎接并执弟子礼。随后，段祺

瑞定居在上海。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因胃溃疡引发大出血而去世，享年72岁。在病危期间，医生和亲友建议他进点荤食以提高抵抗力，段祺瑞坚决拒绝并表示：“人可死，荤不可开！”

在信佛之后，段祺瑞的食谱中，除了自己养的几只母鸡下蛋算得上荤食，其他荤食一概不碰。有趣的是，段祺瑞只养母鸡，而没有公鸡，因为他认为这样下的蛋才是“素鸡蛋”，是可以吃的。他年老后身体虚弱，仍旧不肯开荤，也足见其性格之倔强，又可见其信仰之坚定。

临终前，段祺瑞曾写下亲笔遗嘱，告诫后人：“国虽危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段祺瑞死后，其长子段宏业坚持要将其灵柩送往北京安葬，但因为日本侵华导致时局变动，以至于十多年都无法找到合适的下葬地，最后只能草草葬在段祺瑞三弟之前买好的坟地，位置就在人来人往的大道旁边。对此，段祺瑞的一些生前故旧不禁叹息：“想不到老头子轰轰烈烈一辈子，死后竟然没有一块埋骨的地方！”

直到1963年，在段祺瑞生前好友章士钊、李思浩、曾毓隽等人的努力下，段祺瑞的遗骨才被起出，重新安葬在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中。

3.官员道德楷模——廉洁总理段祺瑞

段祺瑞酷爱下围棋，为此还特意养了一批棋手，每月发给工资，以陪他下棋。同段祺瑞下棋时，棋手们都十分识相——不能赢，因为段祺瑞自尊心很强，输了他会很不高兴；但也不能多输，因为多输的话，会让段祺瑞看不起。

那么，段祺瑞最喜欢和谁一块下棋？

有个小棋手叫吴清源，任段府的棋手时年纪还小，最受段祺瑞的喜爱。他在和老段下棋的时候毫不客气，两人经常下个旗鼓相当。但随着吴清源水平的不断提高，段祺瑞和他对弈往往输多赢少，后来也就不再和他下了，但每个月段祺瑞仍然按时给吴清源发工资。吴清源后来去了

日本，因为有段祺瑞的资助，才能度过在日本的最艰难时期，日后成为日本围棋界的一流高手。

当时，达官贵人三妻四妾很时髦，段祺瑞也不免俗，讨了几房姨太太。他的第四位姨太太，貌美如花，知书达礼，段祺瑞很喜欢她。但她进门后始终愁眉不展，心事重重，只因为她已经有了意中人。段祺瑞便忍痛割爱，吩咐他妻子要像嫁女儿一样，置办嫁妆，吹吹打打，很热闹地成全她和意中人的婚事。段祺瑞让姨太太出嫁的事被传为佳话。

段祺瑞一生没有房产，这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政客中是绝无仅有的。段祺瑞在北京一直是租着房子生活，直到袁世凯以送套房子给他养女的名义（段在原配夫人过世后，娶了袁世凯的养女张氏为妻），给了段家一栋房子。这栋房产的原房主是与袁世凯打牌输了 40 万大洋，才把房子抵押给袁世凯的，可没给房契。等老袁一死，房主的儿子拿着房契来找段祺瑞，要收回房子。段祺瑞见人家手中有房契，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了出去，这栋房子只住了两年。后来段祺瑞到天津、上海，都是租房而居，一生没有置产。

作为一国军政首脑，给段祺瑞送礼的人自然会排成长队，但他从来不收礼，只是遇见最亲近的下属和友人送来礼物却之不恭时，才会在礼物中挑选一两样最不值钱的东西留下，余者则悉数退还。江苏督军齐燮元曾送给段祺瑞几扇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屏风，五光十色，非常珍贵。段祺瑞的家里人十分喜欢，盼望段能留下这件宝物。谁知第二天一早，段就派人将屏风归还给了齐燮元。张作霖给段送来一些东北特产，并不值钱，但段祺瑞死活不肯收，最后在张作霖副官一再恳求下，才勉强收下两条江鱼。只有一次例外，段祺瑞将别人送的礼物照单全收，那便是冯玉祥送来的一个大南瓜，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把南瓜切一半还给冯玉祥。

最可称道的是，他晚年保持气节，不与日寇合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持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多次到天津秘密拜访段祺瑞，想请他出面组织华北政府，并承诺日本将会全力支持。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段祺瑞始终以严词拒绝，誓不与日寇同流合污。

为避开日本人的要挟，段祺瑞举家迁到上海，并公开表明自己的抗日态度。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段祺瑞说：“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

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
“爱国朝野一致，救国唯有自救耳。”

段祺瑞生前身后都口碑如一，成为近代中国政治家的楷模。如果说，段祺瑞一生有污点，那便是他在任期间发生“三一八”惨案，军警屠杀爱国请愿学生，尽管罪魁祸首不是他，但他必须承担领导失职的责任。

段祺瑞在弥留之际，留下了亲笔遗嘱，内讲“八勿”，阐述国家复兴之道，即：“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梁启超对他的评价是：“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

段祺瑞算是个英雄，终其一生都在努力让中国走进民主政治的大门。但他是个末路英雄。令他困惑的是，他要统一中国的计划总是难以实现，反倒因此和北洋兄弟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等兵戎相见。北洋军阀之中，皖系曾势力最大却垮得最早。第一次直皖战争，段祺瑞亲自指挥的皖系军队只几天工夫，就被吴佩孚指挥的直系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他绝没想到，自己乃正统的北洋领袖，民国后第一批被封为最高军衔且是领衔者的“建威上将军”，居然打不过一个犯上作乱的部下，而且，败得血本无归！

面对民主政治大门口的一堆又一堆的历史废墟，段祺瑞无能为力。而正是这一堆堆废墟，堵在 20 世纪初中国的历史当口，致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进程异常迟缓。生不逢时，段祺瑞只能无奈发出千回百转把栏杆拍遍的英雄叹息。

值得一提的是，段祺瑞作为一个在解放后还有争议的北洋军阀，章士钊曾将段祺瑞的历史扼要书呈毛泽东。阅后，毛泽东笑说：“有功有罪，已经化敌为友了嘛。”

4. 拥兵逼宫促共和——段祺瑞一造共和

1933 年 1 月 22 日，身在南京的少将以上的军人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身着戎装到浦口车站恭候一位老人莅临，而蒋介石本人则在下关码

头恭候。当这位老人出现时，蒋介石趋前敬礼，并搀扶他下船。晚上盛宴招待这位老者时，南京冠盖云集，文武要员全部出席作陪。

这位垂垂老者，就是曾经在 20 世纪初叱咤风云的段祺瑞。段祺瑞是北洋军阀的大首领，又是鲁迅先生《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被鞭挞的对象，所以，在很多人的眼中，他便成了“祸国殃民”的大反派。那么，段祺瑞是究竟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震动。10 月 15 日，清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冯国璋所属的北洋军，气势汹汹直扑武汉。但是荫昌没有指挥作战的经验和能力，而且北洋军队并不听从他的指挥。清政府束手无策，只好敦请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几经讨价还价，清政府不得不再让步。10 月 27 日，摄政王载沣下令召回荫昌，而以袁世凯为钦差大臣主持前方军事。同时，改派冯国璋为第一军统领指挥前方作战，段祺瑞为第二军统领负责后方治安。

冯国璋南下时，袁世凯密令其适可而止，见好就收。但冯国璋为抢头功，得寸进尺，增加兵力，继续进攻。北洋军 11 月 1 日攻占汉阳，21 日攻占汉口后，冯国璋复下令猛攻武昌，险些坏了袁世凯“一石二鸟”的好事。此时，袁世凯实际上在谋划：既用清政府镇压革命派，又用革命派逼迫清政府，迫使双方都向他交权。

北洋军攻下汉口、汉阳后，袁世凯下令按兵不动。早在 16 日，他还在湖北督军时，就被清廷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冯国璋是袁世凯麾下大将，虽力挺袁世凯出山，却又钟情于满清皇朝。袁世凯担心自己赴京后冯国璋擅自大举进攻武昌，破坏他“以武力镇压革命军，以革命军逼迫清廷”的大计。于是，急令段祺瑞为第一军统领兼湖广总督，接替冯国璋主持武汉的军事。准备实施用清政府压迫革军妥协的既定方针。

段祺瑞到任后，将司令部从汉口退驻到孝感。1911 年 12 月中旬，表面上，袁世凯与革命党人在上海英租界进行着“南北和谈”。实际上是段祺瑞派亲信廖宇春与黄兴的代表顾忠琛达成了秘密协议：1. 确定共和政体；2. 优待清皇室；3. 率先推翻清廷者为大总统；4. 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5. 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

然而，议和因孙中山的回国而有了变化。1911 年 12 月 25 日，孙

中山从海外回国抵达上海，**12月29日**，在南京的**17**省代表正式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在上海的孙中山得知消息，立即复电南京，表示接受。**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在湖北督军的段祺瑞大怒道：“革命党背信弃义，真是岂有此理！”立即下令前线北洋军炮火齐发，炮弹暴风骤雨般倾泻向武昌城。但他没有挥师进攻，反而以北洋军主力统帅名义，接连电告清廷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声言：“共和思想已深入将士之心，将领颇有不可遏之势。压制则立即暴动，敷衍亦必全溃。”段祺瑞向清廷发出了要求共和的强烈信号。在北京的袁世凯、徐世昌、王士珍等珍等人连忙复电，规劝段祺瑞“切勿轻举妄动”。

孙中山误判了形势，以为清廷军队将领发生了内讧，随即下令黄兴率军兵分六路北伐。无奈南京临时政府的军队都是些乌合之众，面对训练有素的北洋军，根本不堪一击，不久便败下阵来。孙中山只好通电表示：只要袁世凯推翻满清王朝，他随时将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

1月26日，段祺瑞联名握有重兵的**46**名将领，致电清廷内阁、军咨府、陆军部，一致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清廷如不速断，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

2月5日，段祺瑞再率第一军全体将领致电清廷：“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将“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并将其司令部由湖北孝感回迁至河北保定。

段祺瑞的通电，实质上是以武力为威慑的最后通牒。隆裕太后接电后，知道大势已去，无法再拖延时间，慌忙召集皇亲王公商量，于**1912年2月12日**带着**6**岁的溥仪，做了清王朝最后一次朝见。然后发布谕旨，宣布清帝退位。袁世凯与段祺瑞有没有“力倡共和”的直接交流，不得而知，但两人确有推翻清廷统治的某种“默契”。袁世凯大功告成，段祺瑞“一造共和”功不可没。民国建立后，袁世凯顺理成章地被任命为**民国大总统**，段祺瑞出任了新政府的**陆军总长**。

6.历史时空中最诡异的政局——段祺瑞二造共和

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的首任大总统**后，“北洋三杰”中的王士珍因

忠于清廷而退隐还乡，态度暧昧的冯国璋外调南京，只有力主共和的段祺瑞留在北京，因为中央军事还离不开段祺瑞这个北洋军中的元老。然而，随着袁世凯称帝步伐的加快，两人的矛盾逐渐激化。段祺瑞得罪了一心想当太子的袁克定，命运很快发生逆转。

袁世凯的心腹幕僚阮忠枢受袁克定指派，试图动员段祺瑞再一次联络北洋将领，全国通电，拥护袁世凯称帝。不等阮忠枢说完，段祺瑞便愤怒地打断他的话，说道：“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袁大总统早就说过不当皇帝了，你们还敢胡闹！”

段祺瑞的不予配合，令袁克定火冒三丈，便经常在袁世凯耳边聒噪，说段祺瑞坏话，挑拨离间。不久，袁克定亲自前往河北正定请有忠君情结的王士珍出山。王士珍勉强同意后，袁世凯立即任命王士珍为陆军上将，委以统率办事处坐办，从而架空了段祺瑞。

不久，袁世凯主持会议讨论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会上大家义愤填膺，段祺瑞更是拍案而起，怒骂道：“小日本欺人太甚，如此条件过于苛刻，绝对不能接受！”会后，段祺瑞以陆军总长名义，领衔 19 省将军通电请缨，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表示坚决反对签订“二十一条”，甚至不惜与日本人决一死战。袁世凯称帝在即，有人劝段祺瑞，哪怕违心地表示一下“劝进”，也可以改善他与袁世凯的关系，否则他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而段祺瑞则公开宣称：“当年我领衔通电主张共和、取消帝制，如今却要我领衔通电取消共和，拥项城称帝，这种出尔反尔的事我是绝对不会干的！”随后，袁世凯免掉了段祺瑞陆军总长的职务。段祺瑞作为袁世凯昔日的心腹爱将，为什么转而反对袁世凯称帝呢？

事后，段祺瑞对侄儿段宏纲透露：袁称帝前，他曾五次劝阻，结果三次被拒绝，两次吃了闭门羹。他劝阻袁世凯称帝，说此事关系国家安危及袁氏身家性命是万不能做的。而袁称帝后，他未公开声讨，则是出于他受袁世凯几十年知遇之恩。所以，论公，段祺瑞宁死也不参与；论私，段祺瑞从此只有退隐，绝不多发一言。

袁世凯宣布称帝后，随着蔡锷的揭竿而起并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看风使舵的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没想到，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北洋将领会成为他的敌人，而领衔者竟是他多年的左膀右臂。面对内外混乱的

局面，袁世凯想到让段祺瑞出山稳定局势。

此时，袁世凯已在忧急之中病倒，他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人送到段祺瑞手中。信中言辞恳切，希望段祺瑞看在两人多年的交情上，能到中南海一叙。段祺瑞看完信后，如约来到中南海。袁世凯充满歉意地说：“芝泉，你能来真是太好了，都怪我当初不听你的劝阻，闹到今天这个局面。我老了，身体也不好，还是请你出山，再帮我一次……”见到病榻上的袁世凯，段祺瑞答道：“若取消帝制，我愿全力相助。”

袁世凯在公府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段祺瑞、徐世昌外，还有黎元洪，此三人皆为袁世凯称帝前一脚踢开的大员。会上，袁世凯首先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复任大总统，随后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徐世昌为国务总理，黎元洪仍为副总统，责成三人稳定局势。

然而，此时的袁世凯早已不复以前的威望了。南方的革命党人坚决要求其下野，称袁世凯复辟帝制已经背叛了民国，没有资格再任大总统。袁世凯万分失望，他已经看出，黎元洪与他貌合神离，徐世昌对南北双方都起不到作用，只有段祺瑞，既在北洋军中有威望，且与蔡锷等人交情匪浅。进可以讲和，退可以付诸武力，此时恰逢徐世昌请辞，袁世凯便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

此时，全国各地要求袁世凯退位的呼声，与此前全国劝进的呼声一样强烈，南方革命党人坚决要袁世凯下台，否则坚决不进行南北和谈。袁世凯决定武力讨伐，但段祺瑞坚决主张和谈，反对付诸武力。他说：“既然总统坚持用兵，那您就另请高明吧，我辞职！”随即递交了辞呈。

袁世凯不接受他的辞呈，还想亲自布置对独立各省的军事发动进攻，无奈北洋军已不听袁世凯指挥调遣。

不久后，袁世凯最宠信的陈宦突然通电全国，怒陈袁世凯罪状，而这个陈宦在几个月前临离京时，还匍匐在大总统脚下，要求袁世凯一定要称帝，否则誓不回京。亲信的背叛对袁世凯的打击是致命的。袁世凯终日哀叹忠义古风不存，连气带病，最终忧愤积劳成疾，感染重病不治而病逝。

袁世凯死后，能够左右民国政局的实力人物只有段祺瑞了。他既是北洋军的元老，也是民国内阁总理、参谋总长、陆军总长，手里有军队，

又是反对日本“二十一条”和反对“复辟帝制”的急先锋，可谓“德高望重”。

当时段祺瑞想不想当大总统，我们不得而知。当时无论南北两派由谁出任民国总统，都势必会带来南北大动干戈，而令中国重陷混乱，何况北洋军内部并不团结，冯国璋野心勃勃，虎视眈眈。最终，段祺瑞推举“首义”都督而非革命党的黎元洪担任总统。**1916年6月7日**，黎元洪正式就职民国总统，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

7.蹒跚实践民主共和——段祺瑞三造共和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大小军阀几乎个个拥兵自重。倘若在真正的民主宪政下，黎元洪也许是一位有德行的政治家，但在唯凭武力加铁腕手段才能“摆平天下”的时代，黎元洪再有品德也只能沦为滑稽的政治配角。他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终归“位至尊而无权，人至微而言轻”。

在北京没有军权，也没有嫡系军队的大总统黎元洪，与“武昌首义”被逼出来当鄂军都督时一个窝囊样儿，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主。在同段祺瑞的一系列纷争接连失败后，于**1917年5月23日**，终于挺起了腰杆子，一改往日唯唯诺诺的柔弱作风，果断下令免除了段祺瑞国务总理与陆军总长的职务。依据是，段祺瑞秘密与日本签订**1亿元**军事借款，其在国会所做“中日之间绝无秘密外交”的证词被揭穿。

是什么让黎元洪有这么大胆子撤了段祺瑞的国务总理与陆军总长的职务？原来，黎元洪背后有了一位北洋军的实力派给他撑腰，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辫子大帅”、驻扎徐州的长江巡阅使张勋。民国已经走到第六个年头了，张勋依然统领着**58个营**，共计两万多名辫子军将士。张勋看到黎元洪屡受段祺瑞的欺压，便向他伸出橄榄枝，借进京“调停”之名，窃行复辟之实。张勋亲率**5000**精锐辫子兵开赴京城。

1917年6月30日晚，张勋潜入清宫召开“御前会议”。当夜，辫子军占领了交通要道以及媒介通讯部门。**7月1日凌晨**，在康有为、王士珍等保皇派的簇拥下，张勋穿上清代的蓝纱袍、黄马褂，戴上红顶花翎，扶**12岁**的溥仪登基。张勋自任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黎元洪做梦也没想到搬来的救星原来是灾星，他急忙签署了由副总统

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职务的手谕以示罪己，并以大局为重，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令他调遣军队讨伐张勋。

段祺瑞未雨绸缪，驻扎天津的北洋军嫡系部队早已枕戈待旦。此时，他立即组成“讨逆军”，并自任总司令，于天津马厂誓师，公布张勋八大罪状，带兵 5 万余人进军北京，讨伐张勋。

7 月 8 日，段祺瑞通过外交使节转致张勋，提出停战条件四项：（一）取消帝制；（二）解除辫子军武装；（三）保全张勋生命；（四）维持清室优待条件。19 日双方谈判破裂。段祺瑞决心讨伐张勋，战火重燃。

张勋拥清帝复辟之前，段祺瑞已有所闻。张勋召集第四次徐州会议时，下野在天津的段祺瑞派亲信曾毓雋去参加会议。曾和张勋的谋士说，让张勋慎重考虑，如果做了违背共和的事，段祺瑞会第一个站出来抵抗。

当时张勋的谋士“一再否认”，以哄骗段祺瑞。12 日，讨逆军攻入北京。据说全北京城的百姓都爬上城墙观看双方打仗，而这场战斗创下了世界军事史的奇观，“辫子军”一触即溃，整个战斗只死了几个人。得知大势已去，张勋仓皇逃入荷兰使馆。重做皇帝没几天的溥仪，得知复辟失败吓得放声大哭，急忙颁布了退位诏书，为时 12 天的复辟闹剧就这样结束了。

段祺瑞赶走张勋后，恢复共和政府，以“三造共和国”元勋的身份重掌政权。黎元洪自知理亏辞去大总统职务，冯国璋代理总统，段祺瑞自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动荡的时期，上层统治阶级人物思想逐步分化，段祺瑞的思想也在这个历史时期发生了转变，他主张共和，坚决反对帝制，并勇敢地付诸于行动。袁世凯恢复帝制和张勋拥清复辟的失败，主要是全国强烈反对的结果。但作为北洋军阀集团中地位仅次于袁世凯的重要人物，段祺瑞能够首先站出来主张共和，能够对其主子袁世凯恢复帝制采取不合作行动，能够起兵讨伐拥清帝复辟的张勋，在当时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段祺瑞为人严肃刻板，不苟言笑，生活朴素，清廉如水，一生无积蓄、房产，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他一生注重立德立品，是民国初众多具有德行的官员里的佼佼者。

同时，他还具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善于利用政治和军事手腕维护自

己的统治。在“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赶到事发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发誓终生吃素，并将吃素功德回向给这些死者。在他病重时，医生建议他开荤以增强体质，他表示：“人可死，但荤绝不可开。”终于，他为坚

守自己的信仰而从容离世。

段祺瑞一生与共和联系最为密切，为了中国走向共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曾四次发电逼迫清帝退位，三番五次奉劝袁世凯放弃称帝打算并以行动抵抗，后以武力赶走张勋。段祺瑞以实际行动倡导共和、维护共和，这一点足以使他名存中华民族青史。

8.一念嗔心毁共和——乱世棋子黎元洪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新军工程营士兵率先起义，驻地新军大部分响应，一夜之间，武昌光复。**11**日清晨，经过一夜激战的革命士兵，聚集在武昌市阅马厂湖北咨议局开会，成立革命政权，推举都督。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散布的“先知先觉”论和英雄史观的影响下，与会的人普遍认为，参加起义的士兵中没有人够资格当都督。就在大家为都督人选争论不休的时候，当时武昌新军军中一位德行操守有口皆碑的协统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他就是黎元洪。

黎元洪，字宋卿，**1864**年生于湖北黄陂。**19**岁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五年后被派往海军服役，**1890**年调任广东“广甲”兵船三管轮，次年晋升为二管轮。**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黎元洪随舰北上威海卫，在渤海口遇敌，军舰在炮击下沉没，他在海上漂流数小时后得救，大难不死。

战后，黎元洪投奔张之洞，深受器重，曾任炮台监制和护军后营帮带，参与新军训练，并赴日考察军事。**1906**年，黎元洪在改制后的湖北新军中任第**21**混成协协统兼管马、炮、工、辎各队。第二年秋，他率队参加在河南彰德举行的军事演练，获得了“军容盛强，士气健锐，步伐技艺均已熟练精娴，在东南各省中实堪首屈一指”的评语。

从履历可以看出，黎元洪与革命党人、立宪党人都没有关系，这个人凭什么突然闯入历史？有确切史料证明，革命党人此刻选择黎元洪，

并不是仓促之举，早在武昌起义的筹划阶段，为利于起义成功后的政权布局，革命党人就选中了黎元洪，其利有三：一、黎元洪乃名将，用他可以慑伏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威；二、黎元洪乃鄂军将领，素得人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三、黎元洪素来爱护军中文人，而这些文人全是革命党人，容易与他合作。

对于革命党的邀请，黎元洪最初并不情愿。关于黎元洪出任都督的过程，民间普遍有“床下都督”一说。但根据亲历者的回忆以及现有史料《湖北革命知之录》等可以确定，黎元洪是“避入房中”，并非被人从床下拖出。

不管过程如何，黎元洪最后还是勉为其难地答应出任都督。曾与黎元洪私交很好的英国传教士兼记者埃德温·丁格尔认为，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时刻，中国历史的序幕由此拉开。黎元洪的出任，暴露了革命党人对这次起义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以及对自己德行能力自信不足。但是，当时选择黎元洪无疑是明智的。黎都督的出现——至少湖北军政府是这么对外宣布的——对于招抚未参加起义仍在观望的新军官兵及武昌市民，都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形势的发展逐渐有利于革命党人，黎元洪认清形势改变初衷，开始倾向反清革命。他剪掉了长辫子，并召集军官训话，说：“今日革命军起义是推倒清朝、恢复汉土，废除专制、建立共和的开始。我等身为军人，从此须抱破釜沉舟的精神，扫除一切顾虑，坚决去干。”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孙中山兵败流亡海外，袁世凯就任了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黎元洪因没有支持孙中山的“叛乱”而再次成为副总统。

黎元洪心知肚明，袁世凯不好惹。所以，他执意不去北京就职，只想待在武汉。可坐稳江山的袁世凯绝不容许黎元洪独立在他的掌控之外。三番五次请不来后，袁世凯索性将自己的第一爱将兼干女婿、陆军总长段祺瑞，派到湖北担任代理湖北都督，迎请黎元洪到北京赴任，并事先准备好了第二天北上的专列。

1913年，黎元洪赴京，从此就再也没有回过武汉老家。在北京，黎元洪受到了高规格的迎接，在袁克定和总统府侍卫长荫昌等人的迎接下，

他被接上了那辆中国最高规格的金漆朱轮双马车。这辆大总统的专车，除袁世凯本人偶尔乘坐外，此前就只有孙中山来北京时坐过一次。袁世凯将黎元洪安置在了中南海的瀛台。袁世凯还让儿子娶了黎元洪的女儿，两家结成了儿女亲家。尽管如此，黎元洪私下里始终与袁世凯保持着距离。

据黎元洪之子黎重光回忆，袁世凯曾就很多人劝他当皇帝的事情，征求过黎元洪的意见：“近来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么样？”黎元洪正色回答说：“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你做了皇帝，怎能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

在袁世凯的默许下，倡议帝制机关“筹安会”成立。一时间，几乎所有社会名流纷纷拥戴，并组成“公民团”向参议院递交更改国体的请愿书。当时黎元洪正以副总统的身份兼任参政院院长，他不赞成帝制，却又不愿意与亲家袁世凯公开作对，只好以辞职的方式消极抵制。**1915年9月**，黎元洪提出辞去副总统、参政院院长等职务，回原籍休养，袁世凯未予批准。作为补偿，袁世凯以**10万元**高价购得东厂胡同原直隶总督荣禄的一所旧宅相赠，黎元洪于**9月下旬**迁入，闭门谢客，对于时政不发一言。**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决定接受全国各地发来的劝进请愿，将**1916年**定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在**1916年元旦**登基做皇帝。**12月15日**，袁世凯发布了接受帝位后的第一道册封令，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

袁世凯的这招棋非常高明，黎元洪手中虽无一兵一卒，但却是万众瞩目的“武昌首义元勋”，如果将其拉下水，为自己“民国变帝国，总统变皇帝”的戏法造势，其影响可想而知。

但令袁世凯万万没有料到的是，黎元洪竟然不配合，甚至公开表示：“绝不赞同袁世凯称帝，为了民主愿意牺牲个人，亦所得知黎元洪不接受册封，自告奋勇来黎宅游说的社会名流络绎不绝，有的还直接以“王爷”呼之。最后黎元洪实在急了，手指大厅一柱说：“你们如再逼，我就撞死在这里！”

黎元洪大事清楚，小事却装糊涂，除了称帝之事，他从来不对袁世凯发出不同声音。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曾经两任总统，都被迫下野。在总统任期内，黎元洪只不过是责任内阁制下的“橡皮图章”，但他并不甘心如此。有次总理段祺瑞派人让黎元洪盖章，他说要看看，来人很

不耐烦，双方发生冲突。黎元洪一怒之下，违法下令罢免总理段祺瑞，并意外导致了张勋复辟，给民主与共和蒙上了阴影。

一心想为中国带来健全民主机制的黎元洪，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亲手摧毁了中国原本十分脆弱的民主根基。心中有愧的他从此不问政治，开始大规模投资实业，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因脑溢血病逝于天津。

作为黎元洪的老师，严复曾评价黎元洪说：“黎公大德，天下所信。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黎元洪的人品道德，是他在历史上留下的最大口碑。

9. 史上最会创收的总统——“卖鱼翁”冯国璋

北洋时期中国大地战火连连，政治舞台上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很多官场要员都是“临时工”，闹出不少笑话。但其中笑话闹得最大的，当属卖鱼的大总统一冯国璋。他算得上是历史上官衔最高的临时工了。

冯国璋刚刚代理民国大总统，入住中南海。他看见了金水河中池鱼荡漾，便随口问道：“这都是些什么鱼呀？”随从赶紧回答：“这都是历朝紫禁城之主放养的，最大的鱼有好几百斤已经有上百年了。历朝的皇帝还在大鱼身上套金圈，挂金牌呢。”“哦？要是把这些鱼都卖了，

应该值不少钱吧？”冯国璋仿佛是突发奇想。随从们也无言以对，都当他一时兴起，并没有当真。

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是，第二天，冯国璋真的派人把金水河里的鱼都捞了上来，运去市井，沿街叫卖。一时间，北京城内到处都在叫卖“总统鱼”，而且价格不菲。数日之内金水河里的鱼就被抢购一空。时人戏称：“宰相东陵伐木，元首南海卖鱼。”“卖鱼事件”成了历史的笑谈。很多人由此推论，冯国璋是个不学无术、嗜财贪婪之徒。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被时人尊称为“北洋三杰”之一。后人对他的评述如下：他骁勇善战，在“阳夏之战”中，让同盟会“军神”黄兴丢盔卸甲，一败涂地；他廉洁奉公，徒有爱财之名却不曾贪赃。此外，作为袁世凯的亲信，他还公开反对袁世凯称帝。

历史上真实的冯国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冯国璋，字华甫，1859年生于河北河间县西诗经村人，明代开国勋臣冯胜的后代。冯国璋的祖父是富甲一方的财主，可是到了冯国璋这代

却家道中落。在他 25 岁时，经堂叔介绍，冯国璋去大沽口投靠了淮军，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从这时开始直到他病故，冯国璋几乎参与了这段时期内中国发生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

刚过而立之年，冯国璋就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战后，他奉命赴日本考察，从而接触到现代陆军知识。小站练兵时，袁世凯读到冯国璋所著“兵书”后如获至宝，立即把冯国璋招入小站。同时被招入小站的还有段祺瑞和王士珍。

在教学中，冯国璋深受学兵的拥护和爱戴。不久便升为督操营务处总办。冯国璋还和王士珍、段祺瑞等人合力编成《训练操法详晰图说》22 册，成为随营学堂的标准教科书，也成为清朝末年我国军事学校和编练新军的主要教材。一次，袁世凯邀请德国总督一起观看新军的操练，只听台下冯国璋口令洪亮，部队“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直木”。袁世凯大加赞赏，称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为“北洋三杰”。从此，冯国璋也开始了他与袁世凯互利共生的政治生涯。但他过分遵从袁世凯的意图，原本的“北洋之豹”也被后人戏谑成了“北洋之狗”。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一面利用革命军逼迫清帝逊位，一面利用自己手握重兵又身处京畿的优势和革命军和谈。在这期间，冯国璋竭尽所能帮助袁世凯逼清帝退位。1912 年 9 月，冯国璋出任直隶省都督兼民政长。1914 年，冯国璋晋升为陆军上将。

爬上大总统位置以后，袁世凯周围的人极力劝进，他也逐渐产生了称帝的想法。当获悉袁氏父子在京策划帝制的消息后，冯国璋十分惊讶，即刻进京劝阻。在得到袁世凯“如果国人逼他做皇帝，他就去英国当寓公”的承诺以后，冯国璋才返回南京。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前脚刚走，袁世凯后脚就在京城里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帝制。消息传来，冯国璋将信将疑，立即去密电质问总统府机要局局长张一磨，得到的答复是“事出有因”。冯国璋深感受到了欺骗，愤愤不平地说：“他哪还把我当自己人了？”从此，冯国璋与袁世凯的矛盾逐渐尖锐化。

1916 年 3 月 9 日，冯国璋公开反对帝制，成为“北洋派中反对洪宪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他一面联系北洋各方反对帝制，一面要求南方军队“取消独立，退出战区，保护人民”，这就是著名的“五将军密

电”的内容。袁世凯得到密电内容后，深知大事已去，便于 1916 年 3 月 22 日宣布取消帝制，同年 6 月袁世凯病故。

袁世凯病故后，冯国璋出任副总统。一年后，张勋复辟，时任大总统的黎元洪躲进了日本公使馆。冯国璋又一次出面反对复辟。闹剧过后，冯国璋就职代理大总统。但冯国璋不甘心做“活动的盖印机器”，与段祺瑞之间的“府院之争”愈演愈烈。在护法战争后，冯国璋被迫让出“总统”的宝座。

1919 年 10 月，冯国璋经天津抵达北京，他想通过团结直系内部对抗皖系，并伺机寻求东山再起。然而，在一切计划实现之前，他就于 12 月 28 日突然病逝了，时年 62 岁。

冯国璋因为小时候家里面太穷而惜财如命，死后留下的遗产却又极少，这也说明了他虽爱财却不曾贪污。可见“卖鱼闹剧”另有原因。

另外，修订族谱时，冯国璋修改了冯氏族谱的字辈排名，为后世子孙制定了“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的十字排辈次序。到了他的曾孙——著名相声演员冯巩却不敢再用“禁”字辈了。因为“文革”的关系，冯巩不得不用改名的方式来表达和“反动”家庭的决裂。不过，到了后来冯巩的儿子还是按冯国璋定的规矩，使用了“开”字辈。冯国璋的一生是精彩的，也是无奈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判断，不会在一时就有定论。冯国璋是“豹”还是“狗”，也要留给历史去评说了。

10.乱世掌国艰难支撑——“文治总统”徐世昌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虽然建立，但乱象比之清末并没有多少改观。经历了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事件后，国人已经厌倦了军阀割据、南北纷争的现状。特别是“一战”结束后，许多人都对未来重新燃起了希望：“既有‘公理战胜强权’的乐观，也有对‘文治’及和平的憧憬。”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于徐世昌一介文人的身份及其执政的思想，时人立即表示出了莫大的好感。

1918 年 10 月，徐世昌正式成为民国大总统，直至 1922 年 6 月被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赶下台，共在位三年零八个月，他是北洋时期历任民国总统中任期最长的，也是唯一的一位文人总统。

作为一名学者型大总统，徐世昌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

教育等方面多有建树，创造了民国初年的多项第一。

在政治领域，徐世昌做总统的时间最长，经历大事件和政治斗争的经验最多，应变能力最强，在历次的政权更迭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被人称为“水晶狐狸”，是民国第一号政坛不倒翁。在政治改革方面，徐世昌认为发展和建设近代化国家，抵抗外来侵略，必须先搞好吏治。因此，他屡次下令“整肃仕途，奖励贤能”，考核各级官吏，施行廉政建设。他还亲自撰写《将吏法言》颁行全国，供各级官吏学习，足可称为当时的官场第一人。

在经济领域，清末民初全国各地都有“新政”施行，但真正大规模实施且成绩突出者，只有北洋一家，其中包括山东新政、北洋新政和东北新政。而上述这些新政的总设计、总管理、总指挥都是徐世昌。当上民国总统后，他审时度势，利用“一战”后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大力发展工商业，促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经济发展的“黄金期”，赢得了“东方西方化”的美誉，当得起民国经济改革第一人称号。

在军事领域，徐世昌虽然是一介文人，但对中国近代军事的发展影响深远。早在小站练兵时期，他就主张练兵既要学习先进的西方军事制度与技术，又要融入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他亲自设计新军事制度与法规章程，亲自翻译西方和东方军事理论，成为了袁世凯之后的北洋第一人。此外，他还创办新式军事学堂，改革传统的兵役制，使新军成为常备军；他还担任过首任巡警部尚书，亲自训练巡警部队，构建了国家柱石基础。

在文化领域，徐世昌以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而闻名，既是清朝进士，还获得过巴黎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在当时的世界各国领导人中，只有美国总统威尔逊可与之比肩。

在外交领域，在徐世昌当政期间，中国改变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塑造了主动开放的外交大国形象。北洋政府对外积极力争收回东三省、山东、外蒙主权，废除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外国势力的特权，以独立、自主、平等的地位参与国际会议，并拒签巴黎和会上列强间的“分赃和约”。中国初显东方大国强硬、独立、自主、平等、和平的外交形象。

“五四”时期，徐世昌一开始对学生是抱有同情心理的，虽然对学

生的态度随着火烧赵家楼后事态恶化而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这位前清翰林出身的文治总统，对学生和学术界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实际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能够蓬勃地展开，与徐世昌“偃武修文”的治国策略下的宽松政治环境不无关系。

1922 年，徐世昌被吴佩孚、曹锟“逼宫”下野，结束了大总统的政治生涯，回到天津当起了寓公。与北洋政府其他下野官僚不同，徐世昌并没有“伺机而动”、“东山再起”的野心。他寄情于诗词歌赋、书法绘画，创作诗词 5000 余首，楹联 1 万余对，且多为质量上乘之作。至今天津仍留存有多件徐世昌的手迹墨宝，成为珍藏佳品。

11. 史上最会当官的官员——徐世昌官场八字秘诀

历史上，曾为晚清封疆大吏而后出任民国总统的人，只有袁世凯与徐世昌。袁世凯因称帝而臭名昭著，徐世昌则鲜为人知。事实上，在清末民初的大人物中，徐世昌算是地位很高的一号要角。他是晚清的进士，还在民国时获得过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可谓学贯中西。在晚清，他位极人臣，做到军机大臣、太傅衔太保；进入民国后，他做过袁世凯的“国务卿”（内阁总理），后又当了四年民国大总统。

徐世昌是袁世凯的老乡，1855 年生于河南卫辉，字卜五，号菊人。他的仕途之路也是从结识袁世凯开始的。光绪五年（1877 年），徐世昌在河南淮宁县任文案时，结识了袁世凯。袁世凯当时非常倾慕徐世昌的才气，而徐世昌则认为袁世凯是一个有大志的人，相互倾慕之下，两人遂结为金兰之好，徐世昌大袁世凯四岁为兄。青年袁世凯轻财好义，他在得知兄长徐世昌无钱赴省应试后，慷慨解囊，赠送了 100 两银子给徐世昌作为盘缠，以壮其行色，而徐世昌也确实是个才子，他在随后的科举考试之中先中举人，后中进士，最后成了翰林院编修。

甲午战败之后，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在忙碌之余他想到了

徐世昌，便邀请徐世昌来帮忙。从此，徐世昌成为了袁世凯一生中最重要的幕僚高参。徐世昌在小站待了两年多，工作非常勤奋。自学了军事及英语后，他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近代化军事理论，制定了一系列中西结合的军制、法典、军规、条令及战略战术原则，并对小站新军进行训练及教育，成绩卓著。他所做的这些奠定了自己在北洋系中仅次于袁

世凯的地位。可以说，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的历程中，徐世昌功不可没。

徐世昌为人处事十分谨慎，他既能迎合潮流，大办新政，亦不疏远旧派、权要，可谓兼收并蓄，广结广交，左右逢源，上下畅通，因此而赢得了“水晶狐狸”的雅号。徐世昌不仅深得袁世凯的信任，也受到了清政府的赏识，先后出任了首任巡警部尚书、首任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内阁协理大臣，并被授予太傅太保的官衔，在实际上与名义上，徐世昌都达到了清朝官职的最顶点，是清朝历代的汉族大臣中职位做得最高的。

辛亥革命时期，徐世昌与袁世凯重新联手，两个人可以说配合得天衣无缝。袁世凯出山、逼宫、掌权三部曲，导演都是徐世昌。所有人都认为，徐世昌把袁世凯捧上总统的宝座后，国务总理一职非徐世昌莫属。此时，他却急流勇退，退隐到了青岛。

直到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再次请徐世昌出山任国务卿之职，他才正式由幕后走到前台，入京当上了袁世凯的国务卿。老练的徐世昌此时同意出山，是因为经过两年观察，他确定袁世凯的位子真的坐稳了。这充分显示了他在官场上老到的一面——改朝换代、时局不明，不看清楚，绝不轻举妄动。

在北洋军阀各派系的斗争中，徐世昌惯以元老身份作为居间调和者出面因势操纵。徐世昌几经官场磨炼而成为不倒翁，其为政之道就在于精通黄老之术，而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在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他常常能够城府在胸，内敛不张，心中之事不为旁人所窥，是一位玩弄政治的高手。

徐世昌自己总结为官之道有八个字，即“圆通”、“沉稳”、“柔韧”、“机警”。

所谓“圆通”，是指讲话要留有余地，做事要容许转圆，待人要不即不离，做事要八面玲珑。他有天津、河南、浙江三个籍贯，而这三地在晚清都盛产官僚，他处处联系乡谊，对其纵横官场大有帮助；他本与袁世凯等北洋派关系紧密，却又倾力结交南洋的张之洞；他助袁世凯训练新军、治理直隶，甚至改朝换代，却又与满清皇族称兄道弟……这些都是他“圆通”的表现。

所谓“沉稳”，是指遇事故守缄默，或故为回避，不即刻表态，沉

着观变，不到十拿九稳，从不轻易出手。他平时遇到小事，经常唯唯诺诺，似有惧意；但大难当前，却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风范，能当机立断，不怕危险。比如辛亥年他帮袁世凯向朝廷讨价还价，其实风险极大，但他毫无畏惧。

所谓“柔韧”，是指能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徐图东山再起，绝不一蹶不振。清亡后和袁世凯称帝时，他两度退隐田园，却终能两度再起，便是“柔韧”的表现。

所谓“机警”，是指对局势变化的敏感，时机未至则耐心等待，时机成熟则迎头把握。在张勋复辟的过程中，这一性格体现得很明显。

徐世昌秉持这八字原则，在清朝和民国官场左右逢源，最终登峰造极。

第三篇 直奉之争

导语：

◎ 从卖布郎到大总统，曹锟经历了怎样的励志传奇？他为什么被后世骂作“贿选总统”？他的老部下多有投靠日本当汉奸的，面对诱惑曹锟又是如何选择的？

◎ 《时代周刊》封面上刊载的首位中国人是谁？他为什么被称为“三不将军”？他为什么拍桌子大骂张学良？

◎ 革命军北伐的三大军阀之一孙传芳被打败后销声匿迹，他究竟去了哪里？年过半百并且已经皈依佛门的他，为什么惨死在一名妇女的手上？

◎ 张作霖从草根一步步成为“东北王”，甚至统治大半个中国，他有着怎样的不朽传奇？他惨死在皇姑屯，炸死他的真凶又是谁？

1.卖布郎愤而从戎——曹锟正传（上）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是宋朝爱国诗人陆游死前留下的千古绝唱。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爱国的历史名人临终前留下类似的遗愿，表现出伟大的爱国情怀。提及这些名人，谁也不会想到民国时期因贿选一度臭名昭著的曹锟。但是，晚年正处于抗战最艰难的时期的他，临终遗愿却是：“台儿庄大胜之后，希望国军能乘胜收复失土，余虽不得见，亦可瞑目。”

1895 年 **12** 月底，在距天津东南 **50** 里的小站兵营里，袁世凯亲自督建的“新建陆军”正操练得热火朝天。这支新式队伍，采用德日建制，兵种分明，纪律严明、骁勇善战，展现出铁军风范，吸引来大批青年才俊应征入伍。

这一天，有一个手拿武备学堂毕业证和哨官委任状的年轻人，忐忑不安地来到小站的“新建陆军督练处”，毛遂自荐。这个人的出现，引起了袁世凯的注意。他身材魁梧、相貌憨厚，军官出身，又懂经文，与求贤若渴的袁世凯一见如故。袁世凯欣然接纳了他，而且格外重视，很快就委任他为步军左翼第一营帮带。

这个青年军官，就是后来为袁世凯登峰造极立下汗马功劳、继而成为民国第五任大总统的曹锟。

曹锟，字仲珊，**1862** 年生于天津大沽一个造船工家庭。幼年时，曹锟在父亲的支持下读过四年私塾，很有悟性和志气。**16** 岁后，因为家境贫寒，曹锟便肩扛手提开始了他四处流浪的贩布生涯。

不过，做生意并不算曹锟的强项，因为他性情豪爽，待人厚道，喜欢交友，卖布的钱财时常随手花尽。他又好酒贪杯，喝醉了便席地而卧。有时候，街上一些顽童趁机把他钱袋里的钱偷走。曹锟酒醒后发现钱没有了，往往一笑了之，从不追问。别人告诉他是谁拿了她的钱，曹锟也不去追讨，别人问他为什么，他笑道：“我喝酒，图一乐耳；别人拿我的钱，也是图一乐耳，何苦再去追拿？”

于是，大沽一带的人给他起了个“曹三傻子”的绰号。一次，曹锟挑着布匹去保定府贩卖，在城门口被两个守城的士兵拦住。两个士兵见他破衣烂衫，

不但没让进城，反而推推搡搡、谩骂嘲笑了他一番。曹锟无端受辱，窝了一肚子火。他想起自己寒来暑去，历尽艰辛，也未能改变自己吃苦受累的命运，于是他暗下决心，立志从戎。

1882 年，李鸿章在直隶练兵的时候，曹锟应征入伍，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他先是在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做了一名哨官。**1894** 年他曾随部赴朝鲜作战。**1895** 年在小站练兵处投奔袁世凯。

曹锟既无背景，又老实巴交，时常受人欺负。但他憨厚，喜怒不形于色，与人无争，损己利人，吃苦耐劳，千依百顺，不管心中怎么想，

面上从无怨言。此外，他做事一向沉稳，稳打稳扎。这些特点，令他反而逐渐成了气候。

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有个拜把子兄弟叫曹克忠，在当地很有权势，人称“曹大帅”。曹锟听说后，备下厚礼前去拜谒。这曹克忠也是天津人，曾任广东水师提督，一看来了个姓曹的小老乡，很是开心。接着查族谱，发现曹锟竟是自己的孙辈，更加高兴，便正式认曹锟为族孙，并派自己的姨太太去袁世凯那儿为他通融。自此，曹锟走上了扶摇直上的康庄大道，由帮带到帮统，由帮统到统领，由统领到统制，一路升迁，顺风顺水。

曹克忠（1826—1896），字荇臣，乳名二领，北仓镇刘园村人，晚清著名将领之一。咸丰五年（1855）投清军，曾受命于清廷，追剿太平天国和陕甘回民起义军，转战安徽、河南、陕西、甘肃，历任把总、千总、守备，后为甘肃、兰州提督及广东水师提督等职。克忠骁勇善战，屡受嘉奖，从咸丰五年至同治四年（1865）的10年间，几乎每年晋升一次。清史立传曰：“克忠身经百战未曾一挫。”

1907年，历经12年戎马生涯，曹锟升任新军第三镇统制，即中将军长。

然而，多年的南征北战，并没有让他成为一个嗜血的军阀。武昌首义后，各地革命军纷纷起事，曹锟的第三镇奉命赴山西镇压革命军。第三镇不废吹灰之力，就在娘子关雪花山战胜了阎锡山部。战役结束时，曹锟带兵巡视，住在井陘县小学堂。当时队官手执大砍刀押着两个人从外边进来，跟曹锟汇报说抓到两个革命党。曹锟看着这两个战战兢兢的年轻人，不由得心生怜悯，但又不能当着众人的面释放了他们。于是他听完队官的话，便从小坐箱上跳下来，骂了一声：“你们这样的哪配革命呢？”

一人打了一记耳光。队官见此情景，请示曹锟：“跟大人回，我把他们宰了吧！”曹锟立即说：“不用，不用，交给号房，我还有用处呢！”

当天夜里，曹锟对跪在地上的两个年轻人说：“你们二人出门往西北去，慢慢钻山就回去了。千万别向南走，南边尽是我第六协的人。若是别人逮着你们两个，你们可就不易活了。回家好好的吧！”二人千恩万谢，磕了几个头就趁夜色逃走了。

曹锟重视文化教育，重视知识分子，并时常到学校视察。天气炎热时，他看见教授们在课堂内讲得满脸是汗，就命令校工以后上课时必须送毛巾，给教授们擦汗。教授每次发薪，曹锟都会来到学校，将薪水用红纸包好，放在托盘上，高高地举过头顶，敬呈教授。曹锟喜欢对学生训话，每次训话必强调尊重教授，他说：“谁敢对教授不礼貌，就要谁的脑袋。”虽然言辞偏激，但是足以见得他对国民文化的恪守之心。

2. 贿选总统毁一世英名——曹锟正传（中）

袁世凯死后，曹锟、吴佩孚先在直皖战争中排挤走皖系段祺瑞，随后又在直奉战争中赶走了奉系张作霖，直系势力成为了把持北京政府的唯一军政集团。

这个时候，曹锟信心满满，春风得意，不再满足当一个地方军阀的现状。在一帮政客的怂恿下，他决然地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谁料到，就是这一步，不仅给他自己沾上了污点，摧枯拉朽般倒台下野，而且直接导致了中国政局的再一次裂变。

那么，究竟是一件什么事情，让他牵一发而动全身地走向了政治生涯的迟暮呢？

1923 年 10 月 5 日，北京古城，秋高气爽。然而，这一天的气氛却异常紧张。一大早，京畿卫戍司令部的巡逻车就叫嚣着满街跑。街头巷口，警察也多了起来，还有一些鬼鬼祟祟的人物游神般地在街巷中东张西望。更紧张的是众议院，因为这一天是召开国会的日子。

非同往届的是，这次国会的任务是选举总统。国会会场里军警林立，荷枪实弹。进来的议员，务必按“路标”行进，而且只许进不许退，任何人进来了，想擅自退出去是不可能的。就在如

此紧张氛围中，院内却备着丰盛的午餐。**8 点钟**刚过，议长吴景濂便出现在大门外，满面笑容地迎接来自各方各界的议员。议员们明白了：“恩威并用，看来，不投曹三傻子一票是走不了人了！”

由此，在逼走了临时总统黎元洪之后，一场曹锟贿选第五任总统的闹剧正式开演。

黎元洪 **6 月中旬**去了天津，大总统位置一空就是四个月。经过多方努力，国会终于取得了他的 **800 位**成员中的 **590 多**人的承诺，才决定

召开会议。

大选时间虽然定在上午 10 点，实际上到下午 1 点 20 分前，来参加会议的议员还没有达到法定人数。于是，曹锟选举大本营甘石桥议员俱乐部向一些议员秘密承诺：只须列席会议，哪怕不选曹锟都可领取 **5000** 元。这一招果然奏效，到午后，一批又一批议员乘汽车赶到，准备干净利索地投票一拿钱一走人。但是，即便如此，最后仍缺数人，俱乐部便到医院把一些卧病在床的议员用软床抬来，这样才凑足法定人数。

军阀混战时期，民主数遭摧残，国会历经丧乱，议员大多穷困潦倒，且对时局失望至极，早已激情不再，自暴自弃，与民国初年早已大为不同。而曹锟的手段就像棉花蘸糖，温柔甜腻，恰好击中了他们的软肋。人常说“好汉吃软不吃硬”，所以当时从外地返京参会的议员不少，他们抱定了一拿钱便走人的心理。议员们只想占这个现成便宜，而不愿承担任何责任，所以贿选才得以有惊无险地大功告成。这次贿选也断送了议会政治在中国的前途。

贿选，人款两足，就这样水到渠成了。

以 **5000** 元一张选票的价格花钱买总统，本就是商人的手段，曹锟把他做卖布郎时候的经济头脑也带进了他的政治生涯当中。当然，曹锟并没有真正掌控全局，天下人也不全是 **5000** 元能买得动的。

大选当日，曹锟披挂上阵，亲自临场督选。据说，当他走到北京议员国民党员吕复席前时，发现吕复竟没有选他，禁不住心急火燎，竟然附耳轻语：“如何不选曹某？”谁料到，吕复把笔一扔，插着双手大声骂道：“你要能做总统，天下人都能做总统了。你要是当了总统，总统也就不是总统了。”说完，随手操起桌上的砚台向曹锟掷去。

除此之外，直系的政治对手也纷纷拆台。比如曾受排挤的张作霖听说贿选的事后，就勃然大怒说：“曹锟是三花脸，是小丑，我们东北人绝不捧他。”不仅如此，他还宣称议员若能不接受曹锟的贿赂，就可以向他领取相同数目的酬金，这叫“反贿选”。

据史料揭露：当时，共有 **480** 名参会议员收受了曹锟的贿赂。贿金原定数额为每人 **5000** 元，但实际上根据人物地位或作用的不同，高的可达到 1 万元，低的还不足 **2000** 元，都在 10 月 1 日以支票形式发出。整个贿选共花费 **1356** 万元。

曹锟出身小商人，发迹之后尤重敛财。据 1926 年 10 月 10 日成都《民视日报五周年汇刊》登载，曹锟家产为 5000 万元，位列北洋军政人物之首。他本人完全有能力承担所有贿选花销。但此次贿选，花费并非出自曹锟私囊。

直隶省长王承斌为筹集大选用款，逮捕了一批制毒贩毒的奸商，勒令他们以钱赎身，得款数百万，又向直隶 170 个县强迫性借款共数百万元。此外，各省督军、省长多有“报效”，数目最多的为山西督军阎锡山、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每人 50 万元。

曹锟贿选几乎是公开进行的，一方面他在选举程序上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对法定人数等要求都严格遵守；另一方面他也没有采取任何暴力手段，有的人拿了钱不投票，他也没有采取报复手段。

因此，曹锟的部下王坦就曾说：“花钱买总统当，比之要了钱得贪污之名的人强多了，也比拿枪命令选举的人强多了。”

1923 年 10 月 10 日，曹锟终于如愿当上了中华民国的第五任大总统。

曹锟贿选投票结果

下午 2 时正式投票，至 4 时完毕，当众点票：投票总数为 590 张，曹锟得票 480 张，获选为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其余得票人有：孙文 33 票，唐继尧 20 票，岑春煊 8 票，段祺瑞 7 票，吴佩孚 5 票，王家襄 2 票，陈炯明 2 票，陆荣廷 2 票，还有吴景濂等多人各获 1 票。另有废票 12 张。

不过，民国时期的总统可不是那么好当的。北洋派元老王士珍曾经坦言：“如果要害人，最好是请他当总统。”

曹锟上任后，全国各省开始齐心协力地反对“贿选总统”。上海、杭州一些地方的市民上街游行；孙中山下令通缉受贿议员；全国不少地方的市民还砸了受贿议员的家……

面对非难和指责，曹锟不止一次对怂恿他上台的政客们大发牢骚：“你们一定要捧我上台，叫我来活受罪！”眼看着曹锟当了个施展不开威风的大总统，政客们都暗笑他“自己拼着老命来活受罪”。

1924 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战事正酣之际，直系大将冯玉突然倒戈，回师北京，软禁曹锟，发动“北京政变”。11 月 3 日，曹锟

被迫辞职，随即被囚禁在中南海延庆楼。

1926年4月10日，冯玉祥的部将鹿钟麟不满于段、张勾结，又想联合吴佩孚共同对抗奉军，因而发动“驱段兵变”，释放了曹锟。

获释后的曹锟见大势已去，携家眷回到天津，做了寓公。此时的曹锟已经年逾花甲，下野后的他又会面临什么样的人生抉择呢？

3.喝粥也不当汉奸——曹锟正传（下）

1927年2月，在天津英租界内的19号路，曹锟开始了晚年的寓公生活。晚年的曹锟很崇信佛教，还花重金“请”了一尊金佛放在“大悲院”中，并请人画了一幅“圣迹图”，早晚朝拜。

每天早上，习惯军旅生活的曹锟很早就起床，先到院子里练练自编的那套虎拳，之后便焚香打坐。

晚年信佛的曹锟慈悲心渐渐增长，热衷放生。有时听到街上卖鸟的吆喝声，他会全部买下来，打开鸟笼将这些小生命全部放生，然后会向着这些鸟飞走的方向久久注视。

曹锟喜爱书法，喜爱国画，以书画为乐，宗颜真卿，他专门请人刻了个“乐寿老人”的闲章。曹锟还常常请来一些文人墨客指导自己的书画。齐白石和他的交情很深。曹锟的图章大多是齐白石刻的，图章侧边总留有“布衣齐璜”四个字。

1935年冬，湖北水灾，天津绅商举办义赈会，曹锟亲书40副对联捐赠该会。京剧名旦程砚秋有幸购得一联，联文为：“海阔天空，任俺啸傲；鸢飞鱼跃，羨汝优游。”笔力雄厚，字字遒劲。

曹锟的另一大嗜好是收集百家诗钞。他一生共聚齐诗钞1000余首。宋元、明清乃至民国等名家之作，应有尽有，分门别类地收藏，堪称诗学津梁。

除了爱好之外，曹锟还喜欢与邻里共乐。到了夏天的夜晚，曹锟的院子里便热闹起来，住在附近的不少穷邻居吃完晚饭便会聚过来，坐在小板凳上，边喝茶，边聊天。人群中，有拉洋车的，有卖菜的，有卖大碗茶的，还有店铺里的伙计。每当这时候，曹锟就会像大伙儿一样，坐在小板凳上，光着膀子，挥动着大蒲扇，与大伙聊年景，聊行市，聊时局，谈笑风生，其乐融融。此时的曹锟真正尝到了无官一身轻和置身纯

朴百姓之中的快乐。

1937 年，卢沟桥事变，日寇入侵，华北沦陷，曹锬的老部下纷纷投敌：齐燮元，担任伪“华北治安军”总司令；高凌蔚，担任河北省伪省长。同时，日本侵略者千方百计拉拢曹锬出任汉奸政权要职。土肥原贤二与香月清司先后出面游说，都碰了钉子。

一次，几个日本军政要人身着便装，悄悄来到天津英租界，图谋再次邀请曹锬出山。曹锬本想召见，听听他们到底想说什么，却被四房刘夫人拦住，冲着门外指桑骂槐，高声叫骂。日本人本来在英租界就不敢也不能公开露面，只得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刘夫人历数日本鬼子在东三省犯下的滔天罪行，对曹锬说：“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要出去给日本人办事。”曹锬深为所动，连连点头。

日本人对此并不死心，又派齐燮元来劝说。齐燮元趁着夜深求见。曹锬命令侍从不开门，气得齐燮元在门外用拐杖使劲敲门，边敲边嚷。他知道曹锬就在家中，就是敲不开门，气得以后没脸再登曹锬的家。

高凌蔚也奉日本人之命前来拜访，并成功混进了曹家大门。当时曹锬正躺在炕上抽大烟，看见汉奸高凌蔚，不禁勃然大怒，把烟枪往地上一摔怒吼道：“你给我滚出去！往后不许你登曹家的门！”眼见老长官震怒不已，高凌蔚吓得浑身哆嗦，一个字也不敢说，就被几个侍从架出去了。从此，高凌蔚也不敢再来曹家露面了。

1938 年 **3** 月至 **4** 月中旬，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国民党军队，在徐州台儿庄附近集中了 **40** 万优势兵力进行“台儿庄会战”，共歼灭被包围的日军矶谷师团 **8000** 多人及增援的板垣师团 **3000** 多人。这是中国军民在抗战初期夺取的一次难得的重大胜利，意义非同小可。

时已年迈的曹锬，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后，像小孩子一样无比兴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连声说：“我就不信，我们还打不过那小日本！”

1938 年 **5** 月，曹锬因感冒转成肺炎，经医治无效，于 **5** 月 **17** 日在天津英租界泉山里四夫人刘凤玮寓所病故，终年 **76** 岁。临终前，心系国家命运的曹锬还对女儿曹士英说：“台儿庄大胜之后，希望国军能乘胜收复失土，余虽不得见，亦可瞑目。”

因为保持晚节，曹锬死后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前往悼念，葬礼举行得

十分隆重。同样坚持不当汉奸的吴佩孚派夫人张佩兰赴天津吊丧，他本人因奉行不纳妾、不敛财、不出洋、不走租界的“四不主义”，不肯进天津英租界，故在北平身穿重孝遥祭曹锟。

1938年6月16日，在停灵祭拜一个月后，曹锟的家人及其旧僚们为他举行了出殡仪式。曹锟的灵柩暂厝于天津英国公墓。国民党政府有感于曹锟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在6月14日发布特别训令，予以表彰，并追授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

纵观曹锟一生，既风光无限，又历尽浮沉。贿选直接引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一系列影响中国近代史的重大事件随之相继发生。晚年的曹锟坚决抵制日本的诱降，向国人和历史交上了最后的答卷，为自己书写了最后的光荣。

钱剑鸣在《晚节不亏的曹锟》一文中，于结尾处赋诗七绝一首肯定曹锟：“贿选当年酿丑闻，谁知一发动全身。世事沧桑岂能料，晚香依旧在津门。”

4. 《时代周刊》封面首位中国人——三不将军吴佩孚

1924年的中国，军阀割据，动荡不堪。自从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几分天下，中国军阀混战达到最高潮。正值此时，即在1924年9月8日，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在新鲜出炉的《时代周刊》的封面上，赫然刊登着一位留着胡须的中国军官，照片下注明：中国最强者吴将军。这位备受海外瞩目的中国军人，是当时统领中国的直系军阀吴佩孚。

吴佩孚身为一个地方军阀，却被称做能统一中国的人，而且还被冠以“中国最强者”的头衔，而30年前，这位将军甚至还是一位算命先生。从算命先生到中国最强者，这位将军经历了怎样的传奇人生呢？其实吴佩孚从军非常偶然。他从小就在私塾里长大，学习优异。23岁时，金榜题名，中了秀才。他本来是做官的命，却因得罪了有财有势的“老爷”，而被剥夺了功名。迫于生计，当年在四书五经里长大的吴佩孚，成了在北京崇文门外巾帽胡同里算卦写对联的先生。

吴佩孚是一个有志向的人，虽然要挣钱养活自己，但他清楚算卦这行没有发展前途。在堂兄的激励劝说下，他放下了书本，毅然决然地投笔从戎，走进当时动乱中纷争不断的军事领域。

当时有句俗话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参军入伍的秀才吴佩孚趋吉避凶，极力避免成为战场上的炮灰。几年的军旅生活，让吴佩孚学会了许多书外的本领。他深知，要想飞黄腾达，必须要寻找一个合适的靠山。当时北洋陆军第三镇的统制是曹锟，既是老淮军的骨干，又是袁世凯密下的亲信，是北洋系的红人。吴佩孚认准了曹锟的实力，打算投靠，却苦于无法获得曹锟的赏识。

1903 年，日俄战争即将爆发。吴佩孚的机会来了。日本使馆副武官青木宣纯与袁世凯面商中日联合组织情报机构，袁世凯从北洋军中挑选数十名精干士官，与日本组成了联合侦探队。这些北洋军官大多毕业于测绘学堂等军事学校，故工作颇有成效，其中就有后来的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完成了这一出色的任务之后，吴佩孚被派到北洋陆军主力第三镇，从此与日后为民国八大总统之一的曹锟结识，为自己寻得一个强有力的靠山。

事实证明，吴佩孚是一名足智多谋的儒帅，他确实是个能把握机遇的人。第一次是在袁世凯派曹锟率军攻打山西革命军的时候，吴佩孚通报反叛军，曹锟开始格外关注他。

后来曹锟镇压蔡锷的护国运动时，吴佩孚战功卓著，取得了泸州、纳溪的胜利。不仅如此，他还在峡谷中两次营救了被围困的曹锟军队。曹锟感激万分，誓与吴佩孚共进同退、不离不弃。曹锟还向袁世凯禀报了吴佩孚的功绩，吴佩孚被授予陆军中将。

吴佩孚的良策让曹锟躲过与袁世凯同流合污而招致的杀身之祸。战后，吴佩孚得到曹锟的器重与信任，曹锟对他言听计从，他开始锋芒毕露，扶摇直上。随着北洋军阀直、皖、奉三大派系的形成，军事斗争局势变得异常复杂。张勋复辟被推翻后，直系冯国璋当上了代理总统，曹锟是直系西路军队的统帅。而跟随曹锟的吴佩孚，开始谋划借军阀之间的争夺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

1918 年 2 月，西路统帅曹锟令吴佩孚以代理第三师师长身份任前敌总指挥。吴佩孚连克岳州、长沙、衡阳等湘中重镇，被称为“常胜将军”。

但应领攻湘首功的吴佩孚，却得到了不平等待遇，段祺瑞把“湖南督军”的宝座让给了自己的心腹张敬尧，吴佩孚只捞得了“援粤军副总

司令”的虚衔，直系打仗，皖系做官。除了气愤赏罚不明外，吴佩孚还在担心皖系与直系之间矛盾的扩大甚至恶化。

同年 6 月，吴佩孚攻下湖南最重要的战略要地衡阳，打开了通向西南的门户。战后，吴佩孚开始按兵不动，第三师全体罢战。这一举动，使一直暗斗着的直、皖两派已无法再保持“面和”的态势，转入到公开的分裂对抗。

1919 年，全国爆发了反对“巴黎和约”的“五四”爱国运动。面对民族危亡，皖系力主签约。而直系却坚决反对，特别是吴佩孚，还通电大总统徐世昌：“青岛得失，为吾国存亡关头。如果签字，直不啻作茧自缚，饮鸩自杀也。”

这是吴佩孚发自内心的做法，他曾说过：“不爱钱，不蓄妾，不入租界，执简以书，是为真不朽。”在国家民族利益受损的关头，他就是一个富有胆略的爱国军人。

1918 年至 1919 年的两年间，直系兵力日趋强大，从 5 个混成旅扩大为 9 个。与此同时，直系对皖系的不满越积越深。在军事、政治条件皆成熟的情况下，酝酿已久的直皖战争爆发了。

在一旁隔岸观火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看准时机趁火打劫，联合直系军队突然出兵，5 日内便把皖系彻底打败。张作霖帮助直系军阀，实质上是在扩大势力。他根本看不起曹锟和吴佩孚两人，借他们之手除掉老将段祺瑞才是他的大计。

吴佩孚非常清楚张作霖的用意与企图。到 1921 年年底，经过一年多的扩军练兵，吴佩孚在洛阳已拥有十余万兵力，成为直系集团中的主要军阀之一。吴佩孚不甘心在直皖战争中既得利益受损，更愤怒于直系权威受到挑战，终于拉开了新的战幕，打响了他与奉系军阀之间的直奉战争。

可以说，直奉战争的开始，标志着中国军阀战乱逐渐到达了顶峰。同时，这也是吴佩孚个人命运至关重要的一战，因为在这一场战斗中，吴佩孚成为了当时最有可能统一中国的人。

1922 年的 4 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了。曹锟授予吴佩孚军事指挥全权，代表直系以洛阳之师为主力迎战张作霖。虽然当时吴佩孚直接参战的兵力只有张作霖的一半，而且张作霖、段祺瑞和孙中山紧锣密鼓

地搞着“三角同盟”，可吴佩孚似乎能够未卜先知，算到了天机，表现得胸有成竹。

事实证明，吴佩孚的自信不是虚的。大战一拉响，张作霖在北京的两个师便倒戈投向吴佩孚。兵败如山倒，奉系的部队很快就在长城内丧失了立足之地。第一次直奉战争以闪电战的形式意外结束了，奉军损失军费超过 **3000** 万元，被打死、打伤、投降及逃亡人数高达 **10** 万人，仅余 **2** 万多人逃出山海关。

完全掌握了北京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成为了当时最有实力的军阀，就是这位秀才书生吴佩孚，如今手握重兵，控制着直隶、陕西、山东、河南、湖北等省地盘。他 **50** 岁生日时，各地的军政要人、文化名人以及各国驻华使馆的武官云集洛阳，为其祝寿。连名播中外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也来凑趣，献了令人肉麻的寿联：“牧野鹰扬，百岁功勋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此时的吴佩孚叱咤风云，烜赫一时，登上了生命的巅峰。殊不知，一场更加惨烈的激战正在吴佩孚背后悄悄地孕育而生，等待着吞没他的光芒。

5. 书生学者从戎传奇——“学者军阀”吴佩孚

1939 年 **12** 月 **4** 日，戎马半生的吴佩孚因牙疾复发，高烧不退，请日本牙医看病后猝死。时人普遍认为吴佩孚死得蹊跷，猜测是他坚持不肯做汉奸，被日本人所谋杀的。但由于缺乏资料的佐证，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

吴佩孚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代，是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的那段日子，但好景不长。就在美国《时代周刊》对他进行报道的 **7** 天后，也就是 **9** 月 **15** 日，当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的张作霖，以反对直系发动江浙战争为由，出兵 **15** 万，向山海关、赤峰进发。张作霖要报仇雪恨，于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了。就是这次战争之后，吴佩孚走向了人生低谷，而且越陷越深。

历史就是一部闹剧。即便“八方风雨会中州”的吴佩孚也想不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并不是一场将他推向人生顶峰的战斗，而是一场历史悲剧的重演，只不过悲剧的人物恰巧调换了位置。当年吴佩孚攻入北京时，

正是由于张作霖的军队倒戈，顷刻间让兵力不足的吴佩孚局势逆转，大胜奉军。而几年后，当吴佩孚亲率 10 万大军与奉军激战正酣时，直系第三军也发生同样的倒戈，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在后方的 3 万人马从热河撤军发动了“北京政变”，将曹锟囚禁在延庆楼。局势逆转，吴佩孚只能叹息大势已去。

其实，在这次直奉战争中的倒戈，冯玉祥也是被逼无奈。在第一次直奉战争获胜后，冯玉祥功劳甚大，虽然任河南督军，但目空一切的吴佩孚对他并不信任，很快把他调往北京，出任徒有虚名而无地盘的“陆军检阅使”。

冯玉祥与做起了武力统一迷梦的吴佩孚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大。因此，在段祺瑞与张作霖的哄骗下，在孙中山的感化中，一场惊天动地的“北京政变”，才会在冯玉祥的脑海中浮现，并被付诸实践。

直奉战争结束之后，中国的军阀势力形式又回归到一盘散沙的状态。当年美国媒体认为最有实力和机会统一中国的吴佩孚，此时已经回到了洛阳，他手头所剩的残兵不足千人，完全没有了与其他军阀抗衡的实力。趁北方军阀混战之时，1926 年 7 月，南方国民革命军以蒋介石为总司令誓师北伐。吴佩孚的势力范围地处两湖，不幸成为了北伐军的头号目标。

吴佩孚毕竟已经不是四年前“八方风雨会中州”的时候了，他的部队倒戈的倒戈，阵亡的阵亡，北伐军很快占领了他的地盘。吴佩孚只能逃亡北上，可是天公不作美，恰逢冯玉祥从苏联回国，五原誓师，派兵南下。南北夹击中的吴佩孚只好逃出郑州，住进兵工厂。细雨霏霏，冷风落叶。54 岁的吴佩孚浩气丧尽，兵马无几，无奈之下逃往四川。之所以选择逃入四川，是因为吴佩孚雄踞洛阳时，曾扶持过一大批川军。

随着羽翼的日益丰满，蒋介石逐渐展露独霸中国的野心，他对吴佩孚的戒备之心日甚，他不希望这个老将盘踞四川，他日东山再起。因此，蒋介石着手分化吴佩孚在四川的势力。

但经历了太多的战乱后，川军对新崛起的势力心存观望的态度。一时胜券在握的蒋介石，并不能赢得川军的信任。所以川军虽然多打出“国民革命军”的旗帜，却对革命军是否能成功，仍怀有疑虑。所以在四川追杀吴佩孚的通缉令，渐渐成了废纸。吴佩孚在四川的势力也逐渐强大

起来，他已有把蜀陇作为根据地东山再起的想法。看似风光的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只是一场“狐假虎威”的闹剧。

1928年6月，正在幽室作画的吴佩孚，突然被大兵包围。带兵而至的是四川军阀邓锡侯，声称要吴佩孚交出武器，以免除川境战火。如果说战场上的失败算是耻辱，那么一弹不发束手缴械简直是噩梦。但吴佩孚当时寄人篱下，强龙压不过地头蛇，相持一天后，吴佩孚还是交出了部队的精良武器。

接下来的两年里，吴佩孚龟缩在四川境内不敢作为。中原局势却发生大变，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开展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几乎将大半个中国都卷进炮火当中。在这个中原混战的时机，吴佩孚心中也在思索，他是否等到了火中取栗的时机，他是否该去实现他久远的大鹏展翅梦想。

吴佩孚悄悄走出四川，北上进驻甘肃，开始准备重新出山……

6.反日气节留青史——清廉将军吴佩孚

但就在此时，中国发生了最悲痛的灾难，即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因为遵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张学良将东三省拱手让给了日本人。中华大地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高潮。

吴佩孚听闻日本搞伪满洲国的事情后，当即拍案而起通电反对，主张讨伐侵略者。国难当头，吴佩孚再起的夙愿又一次成为泡影。就在此时，日本人找上门来，愿意贷款百万，赠送枪械十万，帮助他东山再起。吴佩孚听完后立即逐客，他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国事过人自了。”

他对日本人的野心心知肚明，他绝不允许自己与侵略者同流合污。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战败的吴佩孚带着妻子东躲西藏，灾难重重，一直过着流浪的日子。他坚守自己不纳妾的信条，一直和妻子张佩兰相依为命。被人称做儒帅的他，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却没有大量的私人积蓄和大片的田产，是北洋军阀中又一位道德楷模。

吴佩孚就这样过着逃亡生活，直到1932年的2月。北国正值冬季，处处冰雪。吴佩孚从内蒙西部的包头乘车去往北京。就在这样一片寒意之中，吴佩孚故地重游，回到了旧梦开始的北京城。

到了北京，吴佩孚从简来到张学良居住的顺承王府，没有半句寒暄，直接质问张学良：“当年沈阳事变，为何不抵抗？”张学良解释说有不准抵抗的命令。吴佩孚当即发怒，拍桌子大骂张学良，骂完后拂袖而去。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东北和华北逐渐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人发现用中国傀儡管理中国人效果更好。为了能在中国的官僚军阀中找出一个来担任伪政府元首，日本人绞尽脑汁。

日本人找来前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暂时充任北平伪政府首脑。不久后，曹锟在拒绝与伪政府谈判后在天津病逝。吴佩孚成为日军眼中华北“元首”的最佳候选人。日本人拟订了“吴佩孚工作计划”，开始威逼利诱他。这一切的幕后推手，就是对中国十分熟悉的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

日本人每月送车马费 **4000** 元到吴佩孚家中，安排汪精卫写信劝说吴佩孚，还通知王克敏和齐燮元不断地给吴佩孚做工作。但一个个汉奸出马都无济于事，一个个日本首脑都被气得恼羞成怒。

晚年的吴佩孚下定了决心，只与经史、诗词、字画为伴，不与任何外人接触，每天拿着扫帚，在庭院内扫扫树叶，打打太极，过清贫自在的日子。

但是没过多久，吴佩孚牙痛发作，传闻是吃饺子时被羊肉骨头扎的。他病情越发严重，腮也肿胀起来，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发誓“不入租界”的吴佩孚，拒绝了儿子到德国医院看病的建议，在家中看了大夫，拔了病牙，却仍然不见好转，几日后便昏迷不醒。

传闻，在齐燮元的安排下，一个日本医生强行来到吴佩孚家中，吴佩孚妻子张佩兰和儿子吴道为了看病没有阻拦。在吴家简陋的病床上，日本医生割伤了吴佩孚的动脉，全家人都慌了，日本军医趁机逃窜出门，不知所踪。吴佩孚这位儒帅枭雄，在 **1939** 年 **12** 月的午后，悄然离开了人世。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曾对吴佩孚的一生作过一番评论，他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个军阀，但他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

第一，他崇拜我国历史上忠君爱国的关羽、岳飞，所以他失败时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他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但他没有私人积蓄，也没有田产，非常清廉。”如上所述，这

就是这位儒帅与众不同的传奇一生。

7.雄霸东南祸起萧墙——孙传芳之死（上）

1924 年，孙中山宣传革命，提倡为官应当人民公仆不要当老爷。有一位北洋军阀听闻后，大笑着骂道：“现在当官的都说自己是人民公仆，欺世谎言以此为最无耻，凡是仆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不是赚主人的钱，就是勾搭主人的姨太太，心狠手辣的做梦都想把主人连骨头带皮吞进肚里。”

这般独特的见解，就是出自当时著名的大军阀孙传芳之口。1935 年 11 月 13 日，下午 2 点，天津市佛教寺院居士林传来三声枪响。寺院之中，枪响之地，一位 30 岁左右的女子手拿勃朗宁手枪，对面一位潜心诵经的居士应声倒地，殷红的鲜血洒满经卷。顿时，大殿内的人四处逃窜，乱作一团。

这个女刺客名叫施剑翘，而死者，正是昔日威震东南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施剑翘为什么要刺杀已经身为居士的孙传芳？普度众生的佛堂，为什么瞬间变成触目惊心的凶险之地？刺杀背后，是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还是另有隐情？

这一切还要从 19 年前说起。

1916 年，随着袁世凯的去世，北洋集团分崩离析，各地军阀据地称雄。这期间，有一个人开始平步青云，官禄亨通，在直系军阀中实力日渐凸显，这个人就是孙传芳。

孙传芳生于 1885 年，字馨远，山东历城人，他出身贫寒，之所以能有后来的成就，完全靠的是在战场上勇猛血战的精神，这种精神也使得他在战争中所向无敌。1921 年，湖南军阀赵恒惕的将领鲁涤平惊呼：“竟有这样的将领，必是孙猴子转世，日后必成大事。”

孙传芳一战成名，吴佩孚亲自约见他，送给他 30 万大洋做军饷，并保荐他当了第二师师长兼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自此飞黄腾达。1924 年，孙传芳的部将齐燮元与皖系军阀卢永祥，为争夺上海地盘而展开激战。“江浙战争”由此爆发，并最终直系大获全胜而告终。在“江浙战争”胜利之后，孙传芳坐收渔利，开拓了大片地盘，并收编了卢永祥的余部约 5 个师的兵力。战功显赫的孙传芳，被曹锟政府授予“恪威上将军”的勋位。

这个时候，奉系军阀张作霖挟其优势兵力南下，图谋问鼎长江下游地区，挑起了直奉大战。战争最紧急关头，冯玉祥在北京发动兵变，倒转枪口攻打吴佩孚。在冯玉祥倒戈后，张作霖率领奉军势如破竹，连下天津、北京、直隶、山东、安徽、江苏、上海。张作霖此时几乎占有了半壁江山。为此，张作霖狂妄地叫嚷：“当今天下，只有我打人，再没有人敢打我。”

孙传芳这时站了出来，公开挑战张作霖：“我要告诉张胡子，老子就敢打你。”1925年10月15日，孙传芳在杭州发兵迎战张作霖。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孙传芳便横扫上海、江苏、安徽、山东等地奉军，活捉奉军前敌总指挥施从滨，并砍了他的头。

施从滨 (1867-1926)，又名从林，字好善，号汉亭，祖籍在今安徽凤阳夏咀村施家嘴。从滨少时在家读私塾，性强悍。15岁投庆军，后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曾三次易主，最后改投奉系。民国3年(1914年)，任镇江镇守使第一混成旅长。民国5年，任张宗昌部下陆军第一师师长。民国12年，任张宗昌部下第二军军长。民国15年，施从滨部与直系军阀孙传芳部在蚌埠激战，施战败被俘，惨遭杀害。

在与孙传芳的战斗中战败后，施从滨的部队纷纷缴械投降以求活命，一时间哭爹喊娘，乱成一团。

为了抓紧时间逃跑，施从滨狠心下令铁甲车开足马力，从士兵身上冲过桥去。铁甲车驶过之处，桥上1000多人立刻化为肉饼，冲下河去的更是不计其数。逃过固镇桥后，施从滨才发现，铁轨已经被孙传芳拆掉，来不及刹车的铁甲车翻到路边，孙传芳的部队一拥而上，施从滨和随从全部被俘。

此时的施从滨已经年届六旬，身穿上将制服，一副老将军的气派。但见到孙传芳后，他竟然毕恭毕敬地行了个军礼，完全不顾自己的将军身份了。没想到，孙传芳对此并不买账。原来，当年施从滨率军南下之时，孙传芳曾连发三份电报，要施从滨与他合作，倒戈反奉，但施从滨未予理睬。对此，孙传芳怀恨在心。

躺在烟榻上的孙传芳一动不动，似笑非笑地对施从滨说：“施老，你好！你不是来当安徽督办的吗？你马上上任去吧！”

说完，孙传芳不顾斩杀俘虏有违惯例的军令，不顾部下的竭力劝阻，

立即下令把施从滨拉到车站南边的空旷地上枪杀了。不仅如此，孙传芳还命人砍了施从滨的人头，悬于车站，暴尸三日，还让人用红字在白布上书写“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

但是，孙传芳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自己的这一声令下，酿成了十年后天津佛教寺院的刺杀血案。

那么，那高悬于蚌埠车站上血淋淋的头颅，与十年后触目惊心的佛堂血案，又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8. 急流勇退后的沉寂——孙传芳之死（中）

凯旋后，孙传芳在南京召开五省联军大会，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聘日本军官冈村宁次、社会名流蒋百里、章炳麟为军事顾问。他还开办江苏联军军官学校，自兼校长。其鼎盛时期的总兵力达 **20** 多万人。从此，孙传芳统辖富庶的东南五省，成为吴佩孚以外最有实力的直系巨头。

孙传芳从一名学兵一跃成为最年轻的北洋军阀，只用了七年。就在孙传芳威望如日中天的时候，一名民间普通女子却对他恨之入骨。这个女子名叫施谷兰，原籍安徽桐城，从小生长在山东济南。施谷兰正是被孙传芳残忍杀害并暴尸的施从滨的后人，但她不是施从滨的亲生女儿，而是自幼被过继给叔父施从滨的养女。

施从滨的死讯传来，施谷兰悲愤不已，她立誓要为养父报仇，并且写诗一首以明心志：“战地惊鸿传噩耗，闺中疑假复疑真。背娘偷问归来使，悬叔潜移劫后身。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伦，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然而，一个毫无势力背景的弱女子，要想去刺杀像孙传芳那样的军阀枭雄，实属天方夜谭。于是，施谷兰将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诚的身上。

1928 年 **11** 月，施谷兰随母亲董氏在领取施从滨的抚恤金的时候，面恳求施从滨的同僚张宗昌寻找机会提拔施中诚。不久，施中诚被升任烟台警备司令。施谷兰提出要施中诚为养父报仇，却被眷恋锦绣前程的施中诚以“报仇时机未到，恁可轻抛生命”为借口拒绝了。施谷兰备感失望，一怒之下，写了封长信，与施中诚断绝了兄妹关系。

那么，父仇未报的施谷兰会就此善罢甘休吗？风起云涌，孙传芳又面临着什么样的政治形势呢？

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讨伐对象，正是张作霖、吴佩孚和孙传芳。不可一世的孙军根本没有把这帮初出茅庐的学生军看在眼里，可是不到一个半月，曾经所向披靡的孙军就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惨败，不得不全部退出江西。

惨败的孙传芳只能妥协忍让，与张作霖化敌为友，共同对付北伐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张作霖早就忘记了当年为奉军作出牺牲的兄弟施从滨。他不计前嫌，与孙传芳结成同盟，组建了安国军政府，并自任安国军总司令，孙传芳为安国军副总

司令，兼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以为有了奉军的支持，就可以挽回颓势。他万万没有想到，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却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势不可当，旧军阀被摧枯拉朽般击溃。

孙传芳集团行将没落，内部也开始纷纷倒戈，叛逃的叛逃，起义的起义。眼看着他的得力战将一个都归附了革命军，孙传芳也感到大势已去。孙传芳兵败如山倒，北伐军很快就占领了杭州、嘉兴、安庆等地，直逼南京。走投无路的孙传芳只能投奔张作霖。

1928年**6**月初，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被炸死，孙传芳被迫逃往沈阳，投奔张学良。同年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归附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其间，对蒋介石恨之入骨的孙传芳，曾多次游说张学良实行东北割据，伺机再度进关，一争天下。张学良并未采纳孙传芳的建议，孙传芳无奈离去。

而这个时候，孙传芳的仇家施谷兰念念不忘复仇，一直在寻找着孙传芳的下落，却因苦无音信而心急如焚。

那么，一度呼风唤雨、嚣张跋扈的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又到哪里去了呢？其实，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便离开了东北，携全家来到天津，寓居租界。孙传芳本有出山主政之意，犹疑之际，北平传来消息，他的老上司吴佩孚为了拒绝日本人的劝请出山，居然把自己的寿棺摆在院子里，表示自己宁死不出山、不当汉奸的决心。这件事一时传为“陈棺言志”的美谈，同时也让孙传芳不敢轻易表示出山主政。

百无聊赖的孙传芳陷入了苦闷、惆怅中，一蹶不振，渐渐地淡出了

人们的视野。

孙传芳寄居天津的第四个年头，施谷兰也带着孩子离开了山西太原，回到天津娘家。临行前，她再次赋诗明志：“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需自出头。”她正式改名为“施剑翘”，不再幻想有好心的仗义侠士替她出头报仇，决心自己动手以了却心愿。

两人虽在同一城市，施剑翘却不知情。为了寻找仇人的影子，施剑翘只能大海捞针，找来近一年的报纸，又跑遍各个书店，买回来一包又一包过时的旧照片，却一无所获。

直到有一天，施剑翘经过一个算卦的小摊，无意间瞥见了一堆杂物当中的孙传芳照片。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仇人的面孔。她花高价买下了这张照片，打算按照照片来寻找仇人孙传芳。但是，仅凭一张数年前的旧照片，又怎能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将他辨认出来呢？正当施剑翘疑虑丛生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线索突然出现了……

9.高僧神算寿命果天数——孙传芳之死（下）

1935 年农历三月初三是孙传芳 51 岁生日，已经退野潜心学佛的，心血来潮地写了一首自寿诗：“本定寿半百，谁知又添一。今日余之乐，世人有谁知。”原来，有一名高僧曾告诉孙传芳，他的寿命只有 50 岁，而孙传芳活过了 51 岁生日。因此，他生日那天便很高兴，自以为改变了命运。

孙传芳怎么也不会想到，数月后，他的生命会戛然而止。

1935 年农历九月十七日，是施从滨被杀十周年祭日。按照旧俗，施剑翘到日租界的观音寺烧纸祭祀。在祭祀的过程中，她无意中听说，居士林中有一位法号“智圆”的居士，乐善好施，皈依前是大名鼎鼎的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一听到孙传芳这三个字，施剑翘不由得怒火中烧。

她想不通：一个杀人如麻的军阀，怎么就变身成为吃斋念佛的居士了呢？事实上，在通电下野后，孙传芳就隐居天津做了寓公。“九一八”事变后，华北成为日军势力范围，日军大本营首选孙传芳出任华北伪政府主席。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与孙传芳是日本振武学校的同班同学，他还当过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可以说二人交情匪浅。但冈村宁次数

次亲自做孙传芳工作，均被孙传芳一口回绝。

孙传芳为了摆脱日本人的纠缠，表示自己不问世事的决心，在原皖系国务总理靳云鹏的影响下，皈依佛门，法名“智圆”。当时有人劝他：“你多少年战场厮杀结下仇家无数，如今皈依佛门孤身一人不带警卫，只恐仇家来寻仇报复。”孙传芳淡淡一笑：“死于同胞之手，比当汉奸卖国贼苟活强上千倍。”

孙传芳经历过风云变幻，遍尝了人间苦乐，因此信佛后不断精进，成为当地非常有名的大善人，做了不少积德行善的事。比如每到夏天，他就在自家门外常备上绿豆汤，免费供行人消暑解渴。**1933**年的秋天，一个盗贼夜入孙家公馆行窃，当场被抓个正着，佣人将他押到孙传芳面前，不想他非但没有责罚，反倒给了盗贼一些米粮。此事，天津《立时报》做了报道：“孙公馆缉贼赏米，中秋夜乐善好施。”

两年时间里，孙传芳日日潜心诵佛，还担任了居士林理事长的职务，乐在其中。尽管如此，他还是逃不过十年前就已埋下祸根的那一劫。**1935**年**11**月**13**日，星期三，居士林讲经日，林长靳云鹏、理事长孙传芳照例应该到场。这天，也是施剑翘预订下手刺杀孙传芳的日子。

诸事具备，不巧天不作美，下起了雨。绵绵阴雨下了整整一个上午，午后依旧阴云密布。施剑翘估计孙传芳不会去听经，便空手来到居士林。

如她所料，孙传芳当时并不在场。然而正当施剑翘与别人说话时，孙传芳身着黑海青道袍来到居士林。

这天，孙传芳一早醒来，就觉得精神不济，但还是勉强起床。夫人不愿他冒雨外出，再三劝阻，但孙传芳以“事先与靳去鹏约好在居士林见面”为由，执意只身冒雨赶赴居士林佛教会。见孙传芳出现，施剑翘急忙租车赶回家中，带上早已准备多时的勃朗宁手枪和传单，再次返回居士林。

掌管佛堂日常事务的法师如同往常一样，坐在居士当中，准备一同聆听高僧的讲经。这个时候，施剑翘的座位离孙传芳比较远，为了接近孙传芳，她就跟看堂人说：“我的座位离火炉太近，烤得难受。前面有些空位，可不可以往前挪一下？”法师点头答应。没想到，正是这不经意的点头，竟让一代枭雄孙传芳顷刻间一命呜呼！

这一天，高僧领颂的是《大佛顶首楞严经》。居士林里按男东女西

分坐两旁，男居士行列之首是靳云鹏，女居士行列之首是孙传芳。当众居士跟着法师齐声奉诵的时候，孙传芳也闭目盘坐在蒲团上一起吟诵，完全没有觉察到死神脚步正悄然逼近。

施剑翘拿出枪对准孙传芳的那一刻，孙传芳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正要回头的一刹那，枪声响了。坐在排首的孙传芳应声倒地，中枪身亡。

完成刺杀后，施剑翘站起身，大声喊道：“各位道友不要怕，我为父报仇，绝不会伤及无辜！”说毕，她从小包里掏出一大把传单，撒到空中，传单上写道：“各位先生注意：（一）今天施剑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为了这一刻，她苦心孤诣准备了十年。

施剑翘随即向闻讯而来的警察交出手枪，并表明：“孙传芳是我打死的，带我去自首。”

当天下午，《新天津报》刊发号外，报道了“施从滨有女复仇，孙传芳佛堂毙命”的特大新闻。第二天，天津、北平、上海等各报都以头号标题刊载了这一消息，全国轰动。

一代枭雄孙传芳就这样离开了人世。纵观孙传芳的一生，他曾经好战成性，机警投机，使他一度呼风唤雨。但他身上有太多北洋军阀的时代烙印，造成他思想陈旧，拒绝接纳新思想和新事物，逆历史潮流而动，终于折戟沉沙，为大浪淘尽。是非成败转头空，孙传芳，这位曾经好战的军阀，放下了屠刀，一心向佛，面对无涯苦海，却一去化成了百年身！

作为北洋军阀，孙传芳的人生并不光彩，但他宁死不当汉奸，仅仅这一点已足以为他不太光彩的人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10.草根英雄的创业奇迹——不朽的传奇张作霖（上）

1928年6月4日，东北王张作霖命丧“皇姑屯事件”。这一事件时轰动了全国，无人不晓。它流传至今，却仍然是一个谜。而事件始末真相，史上众说纷纭。张作霖一生称霸东北，无人敢撼。这样的大军阀究竟死于谁人之手？在此之前，他又是如何一步步走上了大军阀之路？

张作霖，字雨亭，光绪元年（1875年）出生在当时的奉天省海城县的一个小渔村。他从小家境赤贫，8岁时，父亲因赌博被仇家杀害，家

境更加窘困。**13** 岁时，张作霖被迫提前走入了社会。

小的时候，张作霖因为家里很穷读不起书，就站在窗外偷听私塾先生讲课，先生为之感动，便让他免费读了 **3** 个月的书。这就是张作霖读书的全部家底了。

张作霖这个没有家庭背景，也没有社会背景，更没有正规学历的普通东北少年，又是怎么成为东北王的呢？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张作霖加入了马玉昆的队伍抗击日军，并当上了骑兵营的小头目。可惜的是，清军在战争中惨败，张作霖的队伍也在这个时候被打散了。

20 岁的他返回乡里，娶了张学良的生母赵氏，倒插门到了赵家庙村。后来在岳父的帮助下，张作霖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地方武装“保境安民”。直到盛京将军增祺在东北推行“化盗为良”的政策，张作霖抓住这个“招安”的机会，顺利将他的队伍转变成为朝廷承认的巡防营。

清末的东北一直不太平，多年在社会混迹的张作霖长于计谋，巧于应对，反而如鱼得水。**1904** 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张作霖所处的辽西中立区成为日俄争夺的焦点。在夹缝中生存的张作霖，看风使舵，左右逢源，采取谁强大就去投靠谁的策略保存并扩充自己的实力。初时，他接受了俄军的一批军械并为之服务，在俄军战败后又与日军合作，在日俄的争战中渔翁得利。直到清朝末年，张作霖已经由一个拉杆子起事的草莽英雄，变成了手下拥有七个营的统带，成为东北地区一个实力不容小视的军事首领。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之后，东三省陷入了“保皇还是革命”的困境之中。当时驻扎东北的新军将领希望革命，推翻清王朝，而东北三省总督赵尔巽主张暂时观望，反对革命这时，很会做人的张作霖深知赵尔巽的心思，当机立断，亲率所辖步兵 **7** 个营的全部人马从驻地出发，马不停蹄，日夜兼程，直奔奉天。

到了省城之后，张作霖马上求见赵尔巽。赵尔巽这时正苦于被新军包围，于是，张作霖亲率大军帮助解围。随后，在赵尔巽和张作霖的精心布置下，张作霖与新军将领达成一致，同意东三省不参与独立。

这段时期，张作霖因势利导，大有平步青云的势头，他的部队也在不断壮大。同时，刚当上国民大总统的袁世凯，对表现出色的张作霖也

非常赏识。

经过乱世重重考验的张作霖，借助袁世凯、赵尔巽等人之力迅速提升实力，渐生称霸东三省的野心。1912年，清王朝覆灭。袁世凯上台之后，中国的局势并不明朗，非常混乱。张作霖曾考虑借大清的势力做靠山，担心建立共和之后失去自己现有的势力，因而他对待政治态度也是忽左忽右。

为了摆脱被动，他想到另辟蹊径。张作霖发现，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在东三省已经确立了绝对优势。所以，张作霖把目光投向了日本，频频走访在华的各级日本高官。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事，和日本人的交往却引来不明势力的仇视。

1916年，张作霖当上了奉天督军。一天，他在奉天火车站为贵宾送行，随后在卫队的护送下回奉天府。队伍刚刚走到小西门边上，路边的窗口里突然飞出一枚炸弹，炸散了走在前方的护卫队，当场炸死几个卫兵。刹那间，小西门大街硝烟弥漫，乱作一团。

当时，张作霖坐在后面的马车上，听见爆炸声，机警的他马上跳下马车，骑上一匹马，喊上几个护卫兵，抄小道直奔奉天府。可没想到，他们路过奉天图书馆的时候，门洞里窜出来一个人，向快马加鞭的张作霖扔过来一枚手榴弹。不过，张作霖闪躲很快，手榴弹并没有炸到张作霖，反而击中了那个刺客的要害，刺客当场毙命。

张作霖刚刚回到奉天府，卫队就报告，日本铁道守备队队长前来慰问，这令张作霖心中开始产生怀疑，前脚刚刚遭人暗杀，后脚日本人就跟进来，张作霖觉得慰问是假，打探虚实是真的。这暗杀到底是谁在后面指使的呢？

11.还原真实的东北王——不朽的传奇张作霖（下）

刺杀事件发生后，张作霖和他的部下检验了刺客的尸体，发现刺客的脚形有长期穿木屐的明显特征。从这一点上分析，张作霖认定刺客是日本人。那么，是谁想干掉张作霖呢？

张作霖是奉天的督军，日本人想在中国发展势力，应该拉拢张作霖才对，为什么要去杀他呢？难道这里面还会有别的玄机吗？

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相渐渐浮出水面。想要张作霖死的不是别人，

正是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川岛浪速是日本侵华政策的积极推动者，早在袁世凯复辟时期，就策划过满蒙独立运动，妄图把内蒙古东部和整个东北变成日本托管的领土。张作霖和日本人的接触，引起了日本内部的意见分歧。川岛浪速认为，张作霖是实现满蒙独立的极大障碍，必须除掉。但其他的反对派认为，实现满蒙独立，需要拉拢张作霖。张作霖当上督军之后，后者占了上风，川岛浪速意识到事情要变质，决定暗杀张作霖，借此在东北制造混乱，为满蒙独立活动创造机会。

日本当局认为，扶持张作霖可以加速实现满蒙独立，张作霖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武器。可张作霖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在他的眼里，日本人不过是他称霸东三省的一个工具，甚至是他进军中原的一块垫脚石。

从 1920 年起，两次直奉战争相续爆发。战后，张作霖的奉系已经完全控制了北洋政府。1927 年，张作霖如愿以偿当上了北洋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当时中华民国的最高统治者，他的地盘从东三省扩大到半个中国，张作霖的势力在那个时期达到了顶峰。

日本人看到张作霖的势力越来越大，已难以掌控，试图遏制他。而张作霖却认为，进军中原之后，自己的地位和势力会越来越强大，他要摆脱日本的控制。因此，日张矛盾日趋激化。

1928 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北伐军势如破竹，阎锡山、冯玉祥等实力派纷纷响应，吴佩孚、孙传芳等旧军阀节节败退。眼看着北伐军直逼京津，1928 年 5 月，张作霖迫于形势发表了息战通电，希望结束战争，和平相处。而实际上，张作霖是想借和平的幌子，来阻止北伐军前进的步伐。5 月 12 日，国民党中央会议决定，置之不理继续北伐。

在这期间，日本人一直在观望，等待乘虚而入的最好时机。他们已经炮制好了《满蒙新五路协约》。这个协约的核心内容涉及敦图铁路、长大铁路、吉五铁路、洮索铁路和延海铁路五条铁路，就是要把这五条铁路的修筑权全权委托给日本人。这五条铁路向北可以运兵攻打苏联，向南可以运送军资，向东可以连接朝鲜，使朝鲜到东北的运输时间缩短到一天，是相当重要的战略铁路网。一旦被建成，日本人就可以借之完全控制东北。

对于日本人的协约，张作霖左右为难，蒋介石正在北伐，他不得不

和日本人签，但是签了，东北三省就会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张作霖是个精明人，最后，他想出个主意，拖着日本人，不说签也不说不签，只做口头承诺。但拖来拖去，日本当局显得有点不耐烦了。

河本大作，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是一个极端的法西斯主义者，决定用武力解决掉张作霖。为达目的，河本大作为张作霖布下必死阵，他的方案是炸毁张作霖回奉专列火车，炸死张作霖。

河本大作考察了许多铁路地段，最后选择了皇姑屯。皇姑屯是个交叉路口，是张作霖回奉必经之处，恰好也是日本关东军守备之地。

河本大作布置得非常周密，铁轨左右都安装了炸药，分别装在 30 个麻袋里，伪装成护路的沙袋。为了确保刺杀行动万无一失，河本大作还在铁轨上弄了些手脚，并且准备了刺刀队，一旦爆炸失败，刺刀队冲上去趁乱杀死张作霖。

河本大作认为这样的安排是天衣无缝了，却被张作霖的手下意外发现，马上给张作霖发了电报，上面说：日本铁路守备队封锁了皇姑屯交通口一带，构筑工事，情况异常，请大帅慎行。

看到这封电报后，张作霖考虑放弃火车，改坐汽车，但汽车到奉天有数天的行程，并且有的路段凹凸不平，有的地段并没有通汽车。张作霖再三考虑，还是决定坐火车，但张作霖没有按原计划出发。原定出发日期是 1928 年 6 月 1 日，但那天张作霖并没有上车，临时下密令更改行程，但专列依然开往奉天。张作霖在车上安排了五姨太和几个仆人，用来扰乱日本人的视线。

但是，无论张作霖如何更改出行日期，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河本大作的掌控之中。据河本大作口述，他在张作霖身边安插了两个线人。6 月 1 日当晚，线人就把张作霖动身日期和车厢号都秘报给了河本大作。

6 月 3 日晚，张作霖坐上专列前往奉天。6 月 4 日 5 时，火车驶到皇姑屯的时候，日本人引爆了早已装好的炸药。只听一声巨响，冲天火光闪过，张作霖所乘的车厢已被炸翻在铁路旁，黑烟四起。张作霖身受重伤，在被救回大帅府几个小时后，不治身亡，享年 54 岁。

皇姑屯事件后，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前往奉天，接掌了帅印，稳定了东北的局势。但对于皇姑屯事件，事后乃至今日，日本官方也没有公开承认系他们所为。

在清末民初军阀混战的乱世，张作霖的一生可谓是成也日本，败也日本。但不得不说的是，张作霖在生前没有给过日本一寸土地，哪怕是在他的“王朝”要覆灭时，哪怕在他的生命要终结时，哪怕在协约的一字一画上，他也没有把一寸土地给过日本。他一生与日本人巧妙周旋，使《满蒙新五路协约》等涉及主权问题的密约沦为废纸，没有留下任何让日本人侵占中国的借口。

张作霖知道，他是中国人，虽然他是军阀，但他不会忘本，他怕中国人骂他是卖国贼，他怕丢了一寸土地给异族对不起祖宗。他是东北百姓心中永远不朽的传奇。

第五篇 反思北洋

导语：

◎ 发生在二十世纪初的东北大鼠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了半个中国，吞噬了 6 万多条生命，就连国际著名防疫专家也不能幸免，中国政府为什么大胆起用伍连德？中国自己的防疫专家对抗鼠疫的结局又如何？

◎ 北大、清华，中国高等学府中的耀眼双星，两校的传承精神又是怎样产生的？蔡元培、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师又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 很多人将当下国人的道德缺失归责于改革开放，其实，当今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重构五四精神和价值，是中国无法回避的现实命题。

◎ 北洋时期是一段曾经被丑化的时代，在这些尘封的历史面前，很多历史学者不由地感慨：北洋时期是人民最自由的时期，却是统治阶级自身最不自由的时期。

1.中国大学精神探源——国立北京大学

2005 年 9 月 21 日上午，台湾著名学者李敖在北京大学举行演讲，讲题为《歌颂北洋时期的北大》，受到北大学子的热烈欢迎，演讲多次被掌打断。在北大的这段演讲视频很快在网络上传播开来，北大法学院院长贺卫方教授称之为“在大陆掀起了自由主义的旋风”。一时间很多

网友对北洋时期的北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北洋时期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草创期，大学精神的形成期。当年北洋政府虽然是武夫当国，领导人像走马灯一样你上我下，政局很不稳定，但历任的主政者对教育、对思想文化基本上并不控制干预。虽然当时中国经常处于战乱状态，大学的教学环境经常受到冲击，但这一时期大学的精神是独立的，向上的。当时的北大正是蔡元培时期的国立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旧式衙门般的京师大学堂，创立于 **1898** 年，也是中国近代正式设立的第一所大学，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创建初期，学堂里的教师多半为腐儒，滥竽充数，一心只想借此在官场混混。学生多为达官贵人、高干子弟，上学堂只图混个文凭，毕业后好升官发财。民国成立后，虽然京师大学堂名义上改称国立北京大学，但“老爷”式学堂的腐败传统积重难返。蔡元培当时曾对北大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 **1917** 年，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其后，他以身作则，大力提倡“不做官”，不当政客党棍和军阀官僚。他明确提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

北大学生们逐渐意识到：原来大学毕业并不等于科举的进士；学术并不是做官向上爬的梯子，学术就是学术。为什么研究学术呢？一不为做官，二不为发财；首要目的是追求真理，这就叫“为学术而学术”。新的知识阶层最大目标，应该是在科学文化上有所贡献。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不足三年时间，但影响深远。他力倡科学与民主，主张兼容并包，网罗百家，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直到现在，这些主张依然是人们对大学的愿景。蔡元培对大学的定位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1920 年，蔡元培不顾大总统徐世昌的警告，招收了九名女学生，开创了中国高校开始招收女生的历史。北京大学校长自蔡元培之后，从蒋梦麟、胡适到马寅初，都是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方学子，宽容、

自由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被引进到北大校园，形成具有北大特色的思想力量，后来演化为一种大学精神，并形成传统。

宽容和开放的精神使北大得以网罗各方面的第一流人才；更使北大得以培养出一批批在各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的特色人才。在师资聘用方面，北大引进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大批人，同样也聘用了像刘师培、辜鸿铭、陈汉章这些思想守旧但学识渊博之人，一时间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

在学生培养方面，北大历来主张学生自由选课，强调学生自我管理，自由发展。这种宽容为学生充分发挥潜能，自由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教学上，北大学术资源的开放也是闻名于世的，北大至今仍然以宽容的胸襟接待了一代又一代的无名求学者，真正实现了学术为天下公器。

有容乃大，宽容和开放的精神使北大能保持活力和创造力，成就了北大的“大”。

宽容、民主、自由为北大人创造性地发挥提供了条件。中国近代众多的学科领域及其奠基性人物往往都和北大相关，北大人作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建立和发展贡献出一系列开创性的成果。中国的许多大学初创时，师资主要来自于京师大学堂和后来的北京大学。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北大是中国近代大学的孵化器。

思想自由是北大的又一特色。在学术上，各种学说平等共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蔡元培时期开始，北大就把思想自由作为办学的原则。在教学上，北大素有鼓励自由研究的风气，学校对学生管得很少，往往任其自己研究感兴趣的学问。在日常生活中，北大人最注重个性独立，崇尚自由生活。北大的风气自由，并不代表北大崇尚个人主义，相反，北大师生在许多重大历史关头都曾团结一心，共赴国难，表现出高度的使命感和集体意识。

1923年年底，时为代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创立**26**周年纪念会上以《北大之精神》为题发表演讲，将北大的精神概括为“大度包容”和“思想自由”。**1927**年，马寅初先生在北大创立**29**周年纪念会上作同样题目《北大之精神》的演讲，再一次阐述“北大精神”的内涵。

马寅初将北大精神概括为为了国家、社会，不顾一己私利，勇往直前，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的牺牲精神。而在这之前的**1925**年，北大**27**周年校庆时，鲁迅先生在《我观北大》一文里概括北大的两个特点是：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向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蒋梦麟、鲁迅和马寅初的概括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北大精神中宽容、自由、追求进步、勇于牺牲的特点。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大学精神，在“五四”时期，它为新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也成为了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重要发源地和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基地；从而奠定了北大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1962年**2**月**24**日，北大前校长胡适先生在台湾去世，遗体下葬时覆盖的是北京大学校旗，遗嘱为“遗留在北京的**102**箱书籍、手稿、文件，捐赠北京大学”。然而，胡适先生留给北大的最宝贵的遗物应该是：“独立之精神，思想之自由。”这也是北大的大学精神吧。

2.大师情缘——王国维与陈寅恪

北洋时期，很多清华学子的毕业证上，在导师一栏都赫然写着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的大名。在近代中国，这里面的每一位都堪称令人仰止的国学大师。

无疑，北洋时期的清华学子们是幸运的。**1925**年清华国学院刚刚成立时，招来“四大导师”同时任教，就算在那个学术界群星璀璨的年代也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不过两年以后，清华国学院再一次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关注，这一次的关注是因为国学院痛失了一代宗师——王国维。

王国维，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877**年**12**月**3**日生。他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都有卓著的成就，是北洋时期国学的一代宗师。**1923**年遍习西学又留学日本的王国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不过王国维帝师的身份并没有维持多久，第二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对

此事，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从此王国维就以清室遗老自居，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

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桃李门生、私塾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在清华，王国维教出了谢国桢、刘节、徐中舒、戴家祥等人，这些人都是中国近代文化界最中坚的人物，分布在全国各知名大学任教，影响深远。

在这一时期，王国维也结识了史学界的另一位大家——陈寅恪。

陈寅恪，江西义宁人，**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早年，他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学习梵文、巴利文等古文字，并了解西方文化。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所以他的见解总有独到之处，也往往被国内外的学者所推崇。

1925年陈寅恪受聘清华，不过因为要为父亲侍疾，陈寅恪是**1926**才来到的清华。

在清华，王国维和陈寅恪算是真正见面认识了。但他们的联系远远不止于清华，其实陈寅恪与王国维都深受清代乾嘉学派的影响，特别受晚清学者沈曾植的影响更大。王国维一直视沈曾植为师长般敬仰，而沈曾植与陈寅恪的父亲也是莫逆之交，陈寅恪是晚辈，对沈曾植产生仰慕是很自然的。后来陈寅恪从事梵文、西北史地、元蒙史的研究，与沈曾植的影响也不无关系。此外，王国维与西方著名的汉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沙畹等都有密切关系。陈寅恪在巴黎时结识伯希和，也是由王国维写信介绍推荐的。

1926年陈寅恪来到清华园的当晚，便在吴宓的陪同下拜访了王国维。这是两位神交已久的大师的初次见面，这一见就不可收拾，在短短两月的时间里，两位大师就多次交谈，以至王国维在写给罗振玉的信中大赞陈寅恪：“此人学东方言语学，言欧洲学问界情形甚详。”可见这段时间里两人的交谈涉及了东、西文化的多个领域。两人还常常结伴到海王村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淘书，王国维审定中文书籍，而陈寅恪审定外

文书籍及佛藏等。陈寅恪在晚年大作《柳如是别传》中也还在回忆和王国维一起淘书的事情。除了一起淘书，两位大师最大的乐趣就是一起探讨学术，如果有友人在家没有找到王国维，便会马上想到他在陈寅恪家中。王国维五十大寿时，陈寅恪和吴宓早上 8 点便到府祝贺，晚上又准时到王府赴寿宴。这样的交情在当时的清华园是很少见的。

很快，两位就结成了“风义生平师友间”的忘年之交。尽管两人的政治思想并不完全一致，但是，由于学术渊源以及治学方法比较接近，彼此情趣也很相投，两人成为了学术心境最为相知的挚友。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陈寅恪走进了王国维的内心，成为他不可多得的知己。

1927 年 6 月 2 日，王国维独自一人从清华园坐车到了颐和园。购票入园后，他步行到排云殿西的鱼藻轩前，面对着昆明湖水，若有所思，但态度异常镇定，还从怀里掏出烟盒，取纸烟一支，吸之至尽，然后向湖内纵身一跃！园丁听见有人落水，便连忙跑去，把他救了起来，但不到两分钟，已气绝身死。

入殓时，在王国维的里衣中，发现他写给第三个儿子贞明的一纸遗书。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句话引起了外界对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诸多猜测。有“愚忠殉清”说，有“逼债”说，甚至有“惊惧”说。众说纷纭，似乎王先生之死，死得蹊跷，死得怪异。

外界对王国维的死猜测众多，但唯有陈寅恪才真正了解王国维的内心。陈寅恪有一段著名的文字：“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这也许是对王国维自杀原因的最好诠释。

在王国维的葬礼上，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师生只是行三鞠躬礼，唯有陈寅恪跪在地上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一些学生见此情景也跟着行跪拜礼。两年后，陈寅恪又亲自为王国维写了墓志铭《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3.解密重口味的“五四”运动——文化反思录

“五四”运动被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传颂至今，“五四”精英也被塑造成当下年轻人学习的楷模。

“五四”运动倡导“科学”和“民主”，确实具有无可辩驳的积极的历史意义。不过百年后的今天，在民主与法制越来越引起人们重视的社会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五四”运动的一些激进行为及其深层社会影响进行理性的反思。

近年来，一些学者专家开始反思和探讨“五四”运动的口号，他们认为“五四”运动提出了“科学”和“民主”口号没问题，但是从实施的角度来看，仅靠科学和民主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当时中国真正需要的还是人权——老百姓的权利。把这个“科学”和“民主”口号与后来的史实联系起来看，会发现效果不大。实际上“五四”运动以后的北洋乃至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并没有明显的进步，甚至一度出现倒退。这些专家甚至提出，如果“五四”运动的口号改成民主和法制，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可以更好地实质性地促进社会进步。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社会的问题依然很多，能解决问题的也只有民主和法制。

还有一些倡导民族传统文化的国学专家在痛惜当下传统文化断层的时候，有时也会把原因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身上。他们大胆提出一系列假设：没有“五四”，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是不是不会如此严重？由此导致的全民性丧失传统道德信仰的程度会不会轻一些呢？如果没有“五四”运动中一些学生贸然闯进北洋官员私宅家里的鲁莽行为，从而取得“五四”运动的标示性胜利，后来中国是否还会出现不顾法理的暴力文化？

太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反思。让我们先回到 **1919 年 5 月 4 日** 这一天。

1919 年 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诞生了八年的北洋政府刚刚换了第四任总统。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也是在这一年，中国首次以胜利者的名义站上了国际大舞台。**1840 年** 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几乎被西方各国以各种不平等条约瓜分殆尽。民众希望中华复兴的情绪也被压制到了极点。在中国成为胜利者后，中国人民特别是那些饱读诗书的学生们，仿佛看到了中华崛起的曙光。

然而事实再一次证明，没有强大的实力做后盾，即使作为胜利者在谈判桌上也占不到丝毫的便宜。相反“巴黎和会”的西方诸国还准备将德国在中国的权益一次性地转交给日本。“弱国无外交”，参加会议的

北洋代表虽然全力辩驳和争取，但是西方各国仍然态度蛮横逼迫中国签字。

消息传回国内，社会为之哗然。在刚刚经历民主思潮熏陶的中国，接受了民主思想的学子们愤怒了，他们集会、游行、示威。他们不仅提出了“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等要求，还提出了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輿、驻日公使章宗祥等。

这个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已经传进了中国。学生们从“十月革命”的成功中看到了新的希望，“暴力”成了部分学生绝望的呐喊。

愤怒的学生冲进了章宗祥的家，痛打了章宗祥。有些学生冲进了曹汝霖的家，放火烧了曹汝霖的宅院，这就是有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这一天正好是 1919 年 5 月 4 日，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开始蔓延。

当时，北洋政府明令禁止示威游行活动，但当游行开始的时候，北洋政府并没有采取一抓了事的态度。在学生们殴打章宗祥时，旁边就站满了军警。章宗祥向他们提出抓捕学生的要求，军警却回答，没有上面的命令不敢打更不敢抓。“火烧赵家楼”事件中，第一个爬上曹宅墙头的是一名叫匡互生的学生，他刚一探头就差点从墙上吓掉下来：围墙那边全部是荷枪实弹上了刺刀的军警在指向他。但是军警忽然在一声口令下，全部自动取下刺刀，退出枪弹。

“五四”运动中的学生大都抱定了流血牺牲的准备，他们认为血钟不响，民众是不能从酣梦中醒来的。当时政府的军警们却是抱定不能伤害学生的想法，甚至有些军警不惜下跪央求学生退出游行。

最后北洋政府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等官员。学生的目的仿佛是达到了，但事实证明，他们被利用了，那些不平等条约中的信息，正是北洋政府故意泄露给了媒体，以引起国民舆论的抗议浪潮。从而，北洋政府可以在国际谈判席上获得主动。

北洋政府最终以国民反对过激为理由，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注重社会舆论的帝国主义也无可奈何。从这点看，北洋政府策划了一起舆论战，并成功实现自己的目的。

今天我们再看这场运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研究。一个方面是文化意义上的，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正面意义多一些，

它毕竟是一个开启民智的运动，在运动的过程中输入学理，进行思想革命，这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与此同时，一个难以忽视的“副作用”也在悄然发酵，这就是当时大批的社会精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质疑，甚至纠妄过正地全盘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知名学者徐宁骏在 2011 年发表了一篇叫《“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影响》的文章，该文对此论述道：“‘五四’运动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其倡导的自由、民主精神在当今仍然具有时代意义。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五四’新文化运动盲目推崇西方文化，贬低中国传统文化，将传统和现代完全割裂开来，造成民族自卑感和崇洋媚外的心理。使得现代中国人失去了根，失去了认同感。”

也许正是“五四”后，人们失去了对根文化的认同感，所以才出现传统文化的断层，导致传统道德的缺失。时至今日，仍有人一提起传统文化，就以“封建糟粕”为由嗤之以鼻。

这就是历史的误会。另一个方面是政治意义上的，这个方面也存在着值得探询的疑问。

首先，这个运动发起的理由不是十分充分。当时中国人觉得中国要亡了，这是没有道理的。在“一战”时中国参战五次，是参战国，而且是战胜国。但我们的外交失败了，这在今天看来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因为我们是战胜国，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站起来。但仔细回顾历史，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外交失败是必然的。当时中国实际上是参而不战，并没有出什么力，这是其一。其二，巴黎和会是个弱肉强食的会议，当时参加和会的国家被分为三等，第一等是最强的五个国家，而第三等是弱国；第一等可以派五个代表，第二等是三个代表，第三等是两个代表。中国政府派了五个人去参会，结果被人告知是第三等国家，只能派两个代表。换句话说，中国当时是被视为弱国的，没有地位，也分不到什么东西，这是必然的。

当时涉及到中国利益的主要是日本。日本是五大强国之一，在谈判中企图占有战争初期从德国人手里抢过来的中国青岛和胶济线铁路权，也就是在山东的权益。事实上，早在 1915 年这些权益就被日本武力抢去了，日本人已经控制了将近五年时间，我们并非刚失去的。从这个角

度来说，当时中国没有失去什么，而且还得到了一些权益。首先我们的赔款不用支付了，全部免了，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租借地我们可以收回了，

他们的很多在华企业我们可以接管了。虽然我们还是弱国，还是被侵略和侵害的对象，但在当时中国就是这个地位，形势并没有变得更坏，实际上是变好了一些。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要求把山东权益收回，从道义上讲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作为强国的日本不可能向中国妥协，其他列强也都不支持中国的诉求。这个会议本质上就是列强的分赃会议，弱国无外交，积弱的中国在当时不可能有太大的话语权。

因此，在当时有些学生大肆宣讲中国要亡了，是不符合实情的。实际上，当时学生们出来闹，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北洋政府在外交上没有达到国人的期望，政府并没有在公开场合向列强表达过强硬的立场，学生们的愤怒是出于中国政府外交上的软弱。其次，后期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行为。

中国人有一个固有的思想，就是中国人跟外国人打交道吃亏时，从来不管对手有多么强大，只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有内奸。所以，“五四”运动中学生们打倒汉奸的思想迅速在学生中蔓延，他们找那些亲日派或有留日背景政府官员的麻烦，甚至去烧人家房子。当时传言曹汝霖跟日本人密谋，在家中供着日本天皇的画像，这些完全是谣言。但学生们不管，就冲过去把曹家房子烧了，曹汝霖躲起来了，没找着。章宗祥当时也在曹家，被学生们暴打。在没有证据证明曹、章等人是卖国贼的情况下，学生们就把人打了。时至今日，也无任何证据表明曹、章这些人有任何卖国的举措，相反这些人在后来日军侵华后表现出了可贵的民族气节。

五四运动中还盛行抵制日货，在此过程中又出现了大量的非法拘禁。一旦发现有人卖日货，大家就把他抓起来戴个帽子游行；要是买日货，大家就要骂他，剪他的东西；要是坐日本船，大家就在他后面画个大乌龟；这些行为当时非常普遍。

有学者据此发表观点，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提倡个人自由开始的，到政治运动时就开始限制别人的自由了。

“五四”后，人们看到了过激行为是可以换来自己想要的东西的。

俄国是如此，1919 年的中国也是如此。于是一些西方过激的暴力思想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主要的社会思潮之一。

近百年后回望“五四”，用今日的眼光去审视那场具有浩大影响的伟大运动，其功、其弊，都有太多的学术探讨空间。然而追询历史的终极目的在于照亮未来。历史没有“如果”，更不能接受用当下“假设”的结论去评判和定位。亦如法国大革命之于人类历史的进步意义，不会因其曾出现过“断头台”这一残暴象征而有所消解，“五四”运动之于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巨大影响，也不会因为当年一些学生们的“愤青”行为便光辉不在。

5. 唯美的情色追求——北洋时期的爱情故事

北洋时期不仅有政治家们对权力的钩心斗角，有军阀们对地盘的你争我夺，也有让人缠绵纠结的爱情故事。

近千年的礼教传统，让中国青年男女的爱情只局限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辛亥革命的炮声，不仅带来了民主共和的国家理念，也带来了男女追求自己爱情的勇气。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让中国年轻人明白了什么是“个性解放”。

传统礼教和新文化的碰撞，在这一时期衍生出了许多缠绵的爱情故事。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当属徐志摩和林徽因的爱情故事。这些如诗一般的人物，在用他们的经历向现代人诠释着什么是爱情。

自古江南出才子，徐志摩就是近代江南才子的杰出代表。他出生于浙江海宁市硖石镇，年少时在家塾熟读四书五经，长大后留学美、英，可谓是学贯中西。徐志摩和当时的年轻人一样，有一段父母包办的婚姻。他的第一任妻子张幼仪具有中国传统的妇女美德，尊重丈夫，孝敬公婆，贤淑稳重，善操持家务。张幼仪还为徐志摩生育了两个儿子。但这是一桩典型的包办婚姻，徐志摩在把张幼仪娶进门之前甚至都没有见过她。

一个是传统的保守女性，一个是新派的浪漫诗人。这两个人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不幸福的。1922 年，两人在结婚七年后正式离婚。徐志摩觉得这桩婚姻，虽然是个好婚姻，却仅仅是个婚姻而已，不是他想要的爱情。因为徐志摩的理想是：“我将在茫茫人海中寻访我唯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1920年，徐志摩因为崇拜西方的哲学家罗素而到英国留学。就是这个时候，他认识了林长民，并在林长民家里认识了他的女儿林徽因。这时的徐志摩已经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林徽因的才气与美丽让徐志摩感到，他仿佛找到了灵魂的伴侣。

情窦初开的林徽因被徐志摩渊博的知识、风雅的谈吐、英俊的外貌所吸引。但林徽因后来发现，她并不想介入徐志摩的婚姻，因而选择了离开。

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那首有名的《偶然》诗是这样的：“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 你不必讶异 / 更无须欢喜 /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 你有你的 / 我有我的方向 / 你记得也好 / 最好你忘掉 /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这是徐志摩对林徽因感情的最好自白，一见倾心而又理智地各走各的方向，这就是世俗所难理解的一种纯情。

对于林徽因，还有两个男人的爱情值得一提，一个是她的丈夫梁思成，一个是金岳霖。这两个男人都深爱着林徽因。

梁思成作为丈夫，并没有因为妻子有像金岳霖这样的追求者而恼羞成怒，更没有对追求妻子的人怀恨在心，相反他却给了妻子选择的权利。**1931**年，梁思成从外地回来，林徽因沮丧地告诉他：“我苦恼极了，为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第二天，梁思成告诉林徽因：“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你们永远幸福。”而林徽因，不仅没有离开他，反而感动万分地对梁思成说了一句能让世上所有男人都无法拒绝的话语：“你给了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我将用我一生来偿还！”

金岳霖终其一生都在呵护着林徽因。不仅总是选择与林徽因一家比邻而居，而且为林徽因终身未娶。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可谓非同一般。甚至梁思成与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金岳霖自始至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爱了林徽因一生。

如果说徐志摩、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的爱情是悱恻缠绵而又纯洁美好的话，那么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爱情绝对称得上曲折坎坷而又惊心动魄。

赵四小姐原名赵一荻，父亲赵庆华是北洋政府的交通部次长。**1912**

年赵一荻出生在香港，因她出生时东方天际出现一片绮丽多彩的霞光，父亲又给她取名绮霞。因她还有三个姐姐，所以被称为赵四小姐。

拥有如此显赫家世的赵四小姐，上天对她也是格外的垂怜。美丽、智慧和财富，上天都毫不吝惜地给了这个女人。天生丽质的她，在十四五岁时就成了当时《北洋画报》的封面女郎。

就是这样一个女人，选择了私奔去给他人做小。她做这一切的时候只有 16 岁，而她为这一切付出了与父亲断绝父女关系的代价。让她作出这个决定的，就是民初四公子之一，赫赫有名的少帅张学良。

他们相识在一场天津的舞会，少帅英俊潇洒且手握雄兵，活脱脱一个盖世英雄的形象，赵四天生丽质且聪明过人。于是他们像千百年来英雄和美女一样，一见钟情坠入了爱河。赵四为了少帅离家出走，不惜与父亲断绝往来，少帅也顶着巨大的家庭压力，坚持把赵四小姐留在身边。

故事的开头似乎和千百年来美女与英雄的爱情故事没什么两样，但故事的结尾却大不相同。古时项羽与虞姬、玄宗与玉环都弄得英雄迟暮、美人香消。而少帅和赵四小姐的爱情却牵手走过了百年的人生。其间，少帅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遭到软禁。赵四小姐虽无夫人之名，却坚持陪伴少帅度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幽禁生活。

1964 年少帅在取得妻子于凤至的原谅后，与她办理了离婚手续，和相爱了半个世纪的赵四小姐结婚了。这场婚礼迟来了将近半个世纪，但却奇迹般地让他们等到了。50 年对于时间来说只是沧海一粟，但是对于人情世故来说却是沧海桑田。两位老人用生命坚守到了他们爱情圆满的结局。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在那个时代有人选择了无怨无悔地追求自己的爱情，也有人选择了成为自己爱人幸福生活的观众。无论作出什么样的选择，都是源于他们在那个新旧思想碰撞的年代所受到的教育。

对于“新文化运动”，世人对其褒贬不一，有人说它为中国带来新的文化、新的治国理念；有人说它漠视传统文化与道德瑰宝，使传统文化濒临断代的危险，导致世人道德沦丧。

但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告诉我们，新的文化给我们带来的是追求爱情的勇气，而传统文化给我们的却是对爱情的忠贞和坚守底线的情操。

6.态度决定历史——经常认错的北洋政府

谈到新文化运动，人们总是想到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光辉的名字，谈到“五四”运动，人们总想到北大的学生带头走出校门去游行抗议，乃至引发全国性的罢课、罢工、罢市风潮并促成政府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光辉事迹。北洋政府长期以来一直被当做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对立面备受抨击。在一般中国人的历史常识里，最为不值得称道的就是北洋政府，被认为黑暗、反动、卖国。

一直到 2005 年，台湾学者李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里多次提及北洋政府，很多中国人才第一次知道北洋政府真实的一面。

李敖说：“北京大学怎么出来的？是北洋军阀创办的。什么人叫蔡元培做北京大学校长？那时候他是国民党人的身份，是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有这个肚量把全国最好的大学交给和他敌对的一个政治势力的守敌。

我们现在骂北洋军阀，但我们有什么资格骂北洋军阀呢？我们不要骂北洋军阀，我们要做历史性的反省。”

清华和北大的学术自由，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奠定的。正是基于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性，北大、清华在 20 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学术自由，培养和聚集了一大批民族精英。

国立北京大学，作为发源地掀起了爱国主义的浪潮，“五四”运动也率先在北京大学展开。“五四”运动之所以胜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性。在统治期间，北洋军阀对待历次的学生运动确实是比较宽容的。

1926 年 3 月 18 日，数千名学生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示威请愿，执政府的卫队居然在慌乱中开枪。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段祺瑞顿足长叹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惩处凶手，抚恤死难者家属，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面对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道，段祺瑞执政府也没有进一步对受害者加以清算，对学生进行秋后算账，而是默许了人民的各种抗议活动。

北洋军阀集团自袁世凯去世后发生了分裂，政坛更迭频繁，短短的

13 年，就有 38 届内阁，最短的两届只有 6 天。被靠骂政府起家的鲁迅称为“城头变换大王旗”。同时连年的内战，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统治时期的短暂与混乱，加上北洋军阀是革命军北伐的敌人，自然也就不被历史看好。

正是因为这种政府中总统与总理随时都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上台或下台的制度和局面，才给民间与社会创造了宽松自由的大环境，才使得民间与社会的活力能够得到极大的施展与发挥。

老舍《茶馆》中有句台词：民国不如北洋；北洋不如大清。北洋政府选举虽然存在贿选，但是，这也说明北洋政权不敢公开地或赤裸裸地强奸民意。

北洋政府之所以不敢任意妄为，经常被迫向民意让步，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言论自由、组党自由以及民间组织的合法化；另一方面则是北洋政府的官员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都具有一定的个人道德操守，内心有所节制。

北洋政府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明的统治集团之一。在近代历史上不仅对外关系处理较为稳妥，而且对内政治开明，称得上乱世中的治世。

历史上，每个王朝开国，都要大肆杀人。而北洋历史上，却没有出现一个“暴君”。从袁世凯下台，到“五四”运动，到“三一八”惨案，统治者一贯正确的神话被逐渐打破。在政府不义行为发生之后，民众能够伸张正义，一直到政权认错或下台，这在北洋时期的值得肯定的政治现象。

北洋政府的宽容以及经常被迫认错，是建立在强大的舆论监督和强大的民间力量制约之上的。北洋政府官员贪污现象极少，正是得益于政府开放党禁和报禁，用舆论和反对党来制约政府权利的滥用。

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人民不仅有广泛的言论和出版自由，而且还可以组织政党甚至反对党。正是因为北洋政府的开明和宽容，“五四”学生运动才得以顺利开展并最终成功，即便出现了学生暴徒冲击政府打砸抢烧，政府也能保持极大的克制。那一时期的军警不仅不敢随便抓捕学生，而且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外出游行，维持秩序的军警“甚至于有跪地哀求”学生不要游行的。

回望百年前的北洋政府，不少历史学者认为，在舆论环境宽容、言论出版自由、政治空气民主、社会动态稳定等方面还是有其特色的。我们今天还给予极端的负面评价，至少是有违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的。

主要参考文献:

- 1、《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陶菊隐著。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 2、《北洋军阀史话》丁中江著
- 3、《北洋大时代》陈钦著。2013年4月1日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 4、《北洋军阀史》来新夏等著。2016年东方出版中心出版